

清康熙年間的日本調查活動—— 以兩件清宮舊藏長崎相關圖繪爲線索^{*}

劉序楓^{**}

提要

本文主要以兩件清宮舊藏與長崎貿易有關的圖繪，試探討其內容、製作背景、年代，與清代康熙年間（1662-1735）圍繞長崎貿易的中日關係和對日認識問題。

這兩件圖繪據本文考證均繪製於十八世紀初的康熙年間（1662-1722），一名爲〈海洋清晏圖〉，另一爲〈長崎貿易圖〉，二圖原來均藏於清宮中，〈海洋清晏圖〉清末民初流出至日本，收藏於東京帝國大學圖書館，1923年不幸毀於關東大地震，現僅存當時的珂羅版照片。〈長崎貿易圖〉現藏於國立故宮博物院。二圖最大特點爲均是中國人所繪，其製作背景與當時中日貿易有密切關係。康熙帝爲理解日本國內的情況，而派遣人員赴日調查，並製作圖繪。此二圖的存在，不僅印證了史實紀錄，同時也彌補了中日關係史上圖像史料的不足。

關鍵詞：康熙、曹寅、海洋清晏圖、長崎貿易圖、中日貿易、長崎、唐館

* 收稿日期：2021年10月3日；通過刊登日期：2021年12月21日。

本論文爲科技部計畫（MOST 108-2410-H-001-022-MY2）「清代前期中日關係再考——以康熙、雍正年間對日調查活動爲中心」之部分研究成果。寫作過程中，承蒙多位學友以及二位匿名審查人惠賜寶貴意見，謹此致謝。

** 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研究員

一、前言

十七世紀中葉清朝入主中國後，日本幕府憂慮「韃靼」人的入侵，藉由赴日貿易的中國船、荷蘭船及琉球、朝鮮等各種管道，積極蒐集海外訊息，隨時關注東亞，特別是中國本土的情勢變化。但隨著清朝在 1683 年統一全中國，對中國的統治逐漸穩固，並開放海禁，允許一般民衆出海貿易後，這種憂慮也隨之消失。由於江戶時代（1603-1867）的日本實施「鎖國」政策，除中國及荷蘭船外禁止外國船來日貿易，並將外國貿易限制於長崎一港。因此，中日間之貿易交流全賴中國船（日本稱之為「唐船」）往來而進行。表面上看來，日本完全處於被動的地位，但在實際的貿易活動上，主導權則由日本所控制，主要原因在於日本生產清朝鑄造制錢所需的銅。清代前期為確保銅材的來源，康、雍、乾三帝不僅開放日本貿易，同時也不斷地打探日本相關訊息。

有關十七世紀以來清代中日關係的研究，近年已累積相當多的成果。但囿於現存中方史料記載零散不全，主要偏重以日本史料為主的長崎貿易和海外情報收集如「唐船風說書」以及遭風漂流民的救助等研究。¹ 隨著新史料的公開與出版，加上網路資訊的普及，雖有助於此一領域的研究發展，但仍是以前留存日本的史料為中心，中國方面仍侷限於官方的實錄和檔案，以及零散的私人紀錄。²

-
- 1 中日長崎貿易研究的論著主要有：矢野仁一，《長崎市史・通交貿易編東洋諸國部》（長崎：長崎市役所，1938）；山脇悌二郎，《近世日中貿易史の研究》（東京：吉川弘文館，1960）；山脇悌二郎，《長崎の唐人貿易》（東京：吉川弘文館，1964）；中村質，《近世長崎貿易史の研究》（東京：吉川弘文館，1988）；太田勝也，《鎖國時代長崎貿易史の研究》（京都：思文閣，1992）；任鴻章，《近世日本と日中貿易》（東京：六興出版社，1988）；松浦章，《清代海外貿易史の研究》（京都：朋友書店，2002）；近年有彭浩，《近世日清通商關係史》（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2015）等。海外情報收集方面主要有：松浦章，《海外情報からみる東アジア—唐船風說書の世界—》（大阪：清文堂，2009）；孫文，《唐船風說：文獻與歷史——〈華夷變態〉初探》（北京：商務印書館，2011）。另在中日間漂流民救助方面有：劉序楓，〈清代環中國海域的海難事件研究——以清日兩國間對外國難民的救助及遣返制度為中心，1644-1861〉，收入朱德蘭主編，《中國海洋發展史論文集·第8輯》（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山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所，2002），頁 173-238；孟曉旭，《漂流事件與清代中日關係》（北京：中國社科出版社，2010）。相關研究可參看劉序楓，〈漂流、漂流記、海難〉，收入桃木至朗等編，《海域アジア史研究入門》（東京：岩波書店，2008），頁 217-224。
 - 2 主要的私人著作有康雍年間童華（1675-1735）之《童氏雜著》所收的〈長崎紀聞〉，收入北京圖書館古籍出版編輯組編，《北京圖書館古籍珍本叢刊》（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88，據北京圖書館藏雍正十三年序刊本影印），冊 79，頁 796-801；乾隆年間汪鵬之〈袖海編〉，收入（清）王錫祺輯，《小方壺齋輿地叢鈔·第10帙》（臺北：學生書局，1985，據清光緒三年上海著易堂排印本影印），頁 269b-273a；（清）翁廣平（1760-1842）編之《吾妻鏡補》，收入王寶平編著，《吾妻鏡補——中國人による最初の日本通史》（京都：朋友書店，1997）等。

至於針對清朝前期中日間政經關係的研究，則主要集中在明清交替時期東亞諸國的因應；或康熙、雍正年間因華人商船大量前往長崎貿易，引發的商人私載違禁人、物事件的問題；以及日本實施正德新例，限制貿易等事件時，商人間因爭奪「信牌」，而引起紛爭等的討論。本文所討論康熙年間派員赴日調查問題，³雖已為學界所周知，但僅止於派遣的事實，詳細內幕和前因後果，仍充滿許多謎團，由於史料固定，少見新史料補充，難有新的突破。

本文以前人研究為基礎，特別再針對為學界所忽視的兩件清宮舊藏長崎相關圖繪，試探討這些圖像的內容、製作背景、年代，與清代前期圍繞長崎貿易的中日關係和對日認識問題。此二圖最大特點為均為中國人所繪，不僅彌補了中日交流史上對日本認識圖像史料的不足，也印證了康熙帝派員調查日本動靜的史實。

二、曹寅（1658-1712）與〈海洋清宴圖〉

（一）從一件流失的清宮舊藏圖卷談起

在日本大正七年（1918）長崎縣立圖書館館長永山時英（1867-1935）策劃的日本對外關係史料展覽會中展出一卷名為〈海洋清宴圖〉的畫卷（圖1），此畫卷據出版圖錄的說明為：

3 相關研究主要有：浦廉一，〈明末清初の鮮滿關係上に於ける日本の地位（一）、（二）〉，《史林》，19卷2、3號（1934.4、7），頁246-270、534-558；佐伯富，〈康熙雍正時代における日清貿易〉，《東洋史研究》，16卷4號（1958.3），頁375-415；宮崎市定，〈探聽日本動靜摺〉，收入氏著，《政治論集》（東京：朝日新聞社，1971），頁255-279；大庭脩，〈江戸時代の日中秘話〉（東京：東方書店，1980）；大庭脩，〈江戸時代における中國文化受容の研究〉（京都：同朋舍，1984）；大庭脩，〈德川吉宗と康熙帝〉（東京：大修館書店，1999）；松浦章，〈杭州織造烏林達莫爾森的長崎來航とその職名について——康熙時代の日清交渉の一側面〉，原載《東方學》，55輯（1978），後收入氏著，《江戸時代唐船による日中文化交流》（京都：思文閣，2007），頁77-97；松浦章，〈康熙帝と正德新例〉，收入氏著，《江戸時代唐船による日中文化交流》，頁98-121；劉序楓，〈十七、十八世紀の中國と東アジア——清朝の海外貿易政策を中心に〉，收入溝口雄三等編，《アジアから考える・2・地域システム》（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1993），頁87-129；岩井茂樹，〈清代の互市と“沈黙外交”〉，收入夫馬進編，《中國東アジア外交交流史の研究》（京都：京都大學學術出版會，2007），頁358-377，後再收入岩井茂樹，《朝貢・海禁・互市：近世東アジアの貿易と秩序》（名古屋：名古屋大學出版會，2020），頁221-262等。日本相關研究另可參看薛明，〈日本學界關於清代中前期中日關係史的研究〉，《外國問題研究》，2012年3期，頁30-37。中國方面有易惠莉，〈論入關前後的清與日本關係〉，《學術月刊》，2001年1期，頁62-67；易惠莉，〈清康熙朝後期政治與中日長崎貿易〉，《社會科學》，2004年1期，頁96-105；易惠莉，〈清代中前期的對日關係認識〉，《思想與文化》，5輯（2005.12），頁339-384；薛明，〈清前期的中日關係研究〉（瀋陽：遼寧大學出版社，2014）；王來特，〈近世中日通商關係史研究：貿易模式的轉換與區域秩序的變動〉（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18）等。

海洋清宴圖

東京帝國大學藏

傳ふ清朝の御物なりしと、幅凡一尺八寸、長凡三十尺、絹本極彩色、上海より長崎に渡航の圖なり。(下略)⁴

所掲載の圖片爲當時以珂羅版 (collotype printing) 縮小印刷的黑白照片。全圖卷切割爲八張圖片，內容描繪由上海到長崎港的海路航程景象，特別又著重對長崎港景物的描繪，並對特殊景物、建築、船隻貼上計 52 處的漢字榜題文字說明。可惜當時圖片印刷效果不佳，無法解讀所有說明文字。掲載圖片中未見圖卷前後序跋，也無法看出是否有作者落款及收藏印，但從圖錄說明可知，此圖卷「傳爲清朝皇室的御物 (收藏品)」。

加上繪畫風格和榜題的說明文字，以及對上海港周圍建築、船隻和出海口的精細描繪，可推知爲中國人所畫。

經檢索清宮的收藏，在乾隆二十六年 (1761) 內務府造辦處奉乾隆帝之命，將內府輿圖房所藏輿圖分類編成的《蘿圖薈萃》目錄中，「江海」類有共 39 種 (49 件)，其中有「海洋清晏圖一卷」。⁵ 可惜無詳細說明文字，「晏」字與日本著錄的「宴」有別。再查清嘉慶十一年 (1806) 慶桂所編的《國朝宮史續編》，把清內府所藏輿圖再增補收入書內。其中圖繪的「江海圖目」中亦著錄「海洋清晏圖一卷，絹本，縱一尺七寸五分，橫二丈五尺二寸。」⁶ 加注了尺寸，以清營造尺 1 尺換算爲 32 公分計算，約爲 56×806 公分。與《對外史料美術大觀》所記尺寸「幅約一尺八寸，長約三十尺，絹本」(1 日本尺等於 30.3 公分，約 55×909 公分) 相較，縱寬差距不大，長度則有些差異，《對外史料美術大觀》的計算不知是否爲裱裝後的總長，或僅是畫心？但同爲絹本，極有可能是同一件畫卷。

4 永山時英編著，《對外史料美術大觀》(長崎：藤木博英社，1918)，圖 89 (其一、其二)。日本國立國會圖書館線上資料庫雖有提供所藏的圖檔，但效果欠佳，本文圖檔使用作者個人藏本之圖片。另中研院人社中心圖書館及臺史所檔案館亦收有相同刊本，可參考。

5 《蘿圖薈萃》，按其內容分爲 13 大類，即：天文類 2 種 17 件，輿地類 258 種 338 件，江海類 39 種 49 件，河道類 45 種 59 件，武功類 10 種 21 件，巡幸類 31 種 223 件，名勝類 31 種 35 件，瑞應類 2 件，效貢類 4 種 5 件，鹽務類 4 件，寺廟類 18 種 22 件，山陵類 4 件，風水類 8 件。刊本收入汪前進選編，《中國地圖學史研究文獻集成》(西安：西安地圖出版社，2007)，冊 5，附錄，頁 1878。

6 (清)慶桂等輯，《國朝宮史續編》，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續修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據遼寧省圖書館藏清嘉慶十一年內府抄本影印)，冊 825，卷 100，頁 868，「書籍二十六 圖繪二」，「江海圖目」，頁 22a。又，(清)慶桂等輯，左步青點校，《國朝宮史續編》(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94)，頁 1016。

再回到原收藏的東京帝國大學，此圖於 1923 年 5 月，在東京帝國大學史料編纂所的第 11 回「史料展覽會」中再度展出，同展出目錄的說明文字如下：

この圖卷，海洋清宴圖と題す，清宴は平和の意にして，海洋清宴圖は猶ほ海外交通圖と言はんが如し。圖は上海長崎間交通の景況を錄せるものにして，楊子江口水色の變ずる所など，特に意を用ひたるを見る。長崎港に，元祿六年（筆者按：二年之誤）新築せる唐館有りて，同十五年，其前面の海を埋めて再建せる新地唐人荷物藏無記を以て見れば，元祿年間，是地に在りて清國畫工の作れることを知るべし。唐船に日章旗を掲げたる所以に至りては未だ考へ得ず。⁷

明確指出此圖為中國畫工所畫，其年代為日本元祿二年（1689）唐館建成至新地貨庫尚未建成的元祿十五年（1702），也就是康熙二十八至四十一年（1689-1702）之間。但並未提及此圖卷曾為清朝的宮中舊藏。有關此圖內容及相關問題的討論，後文再述。

康熙二十八至四十一年之間，由中國畫師所繪的上海至日本長崎的航海景觀圖，而此圖又曾收藏於清宮中，這與康熙帝和當時清朝與日本又有什麼關連？

（二）康熙年間的銅政與日本

清朝政權成立後，為支付官吏及軍隊的兵餉，另為安定社會經濟，不得不鑄造大量的小額貨幣，即銅錢（制錢），使之流通。但清初之中國仍屬混亂時期，為對付東南沿海的反清勢力，而實施海禁，對國內銅山的開採及海外貿易相當消極。鑄錢之原料除少量國產銅外；主要靠回收舊銅器及前代的舊錢。⁸ 康熙二十三年（1684）開放海外貿易後，鼓勵商人出洋辦銅，當時主要的銅產國就是日本。1684 年開放之初，赴長崎之中國船僅有船 24 艘，1685 年突增至 85 艘，1686 年 102 艘，1688 年達到 194 艘，⁹ 顯示出從事海外貿易有相當大的利益，而洋銅（日本銅）自此成為清朝銅材的最主要來源。

7 東京帝國大學文學部史料編纂掛編，《第十一回史料展覽會列品目錄》（東京：東京帝國大學文學部史料編纂掛，1923），1923 年 5 月 4 至 7 日，頁 26。

8 參看劉序楓，〈清康熙～乾隆年間洋銅的進口與流通問題〉，收入湯熙勇主編，《中國海洋發展史論文集·第 7 輯·上冊》（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山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所，1999），頁 93-144。

9 （江戸）田邊茂啓，《長崎實錄大成》（長崎：長崎文獻社，1973），卷 11，頁 258-259。

但隨著渡日貿易船之增加，幕府恐貴金屬大量流出，也恐造成市場混亂，於貞享二年（1685）發布貿易限制令（貞享令），將唐船之貿易額限制為一年銀 6000 貫（1 貫等於 100 兩），依入港順序計算，貿易總額達到銀 6000 貫後，對其後入港之船則不許貿易，強制回國。但遣返船隻中，許多貿易船仍徘徊在日本沿海，伺機進行走私貿易。幕府乃於 1688 年（康熙二十七年）起再將中國貿易船數分為春、夏、秋三季，依出港地別限定為 70 艘，1689 年設立「唐人屋敷」（唐館），將赴長崎的中國商人及船員強制居住於此，禁止與一般日本人接觸，以防止走私，也便於管理。¹⁰ 除此之外，實施定額貿易制度後，為因應唐船帶來過多貨物的問題，1695 年應日本商人的請求，另批准「銅代物替」貿易之法，即在定額貿易結束後，允許唐船將剩餘的貨品交換銅，其額度在 1696 年時定為 5000 貫（唐船 4200 貫、荷蘭船 800 貫）；到 1699 年更將定額貿易再追加 2000 貫，但僅限於交換海產品（主要為海參、鮑魚、魚翅、海帶等）及雜貨，商人再將所得之利潤，按一定比例上納給幕府。¹¹ 這一連串的貿易改革主要是因應激增的唐船，也為防止銀的大量流出。

日本銅的輸出，由於前述日本幕府對金銀輸出的限制及實施「銅代物替」貿易後，自 1696 年起急速擴大。僅就唐船輸出之銅而言，1684～1695 年間每年平均有 300～400 萬斤；銅產最盛期的 1696 年（康熙三十五年）更超過 700 萬斤。¹² 但因大量的開採及輸出，導致銅產日漸減少，不敷國內所需；加上「倭物」（專指海產品中之海參、鮑魚、魚翅三種）亦生產不及，無法應付大量的輸出，為此，日本不得不再加強對貿易的限制。1698 年設立「長崎會所」，將以往分散的貿易會計管理集中，對主要輸出品之銅、海產品等，從產地收購輸送到加工；輸入品的國內販賣等貿易事務；以及貿易利益的上納，完全壟斷獨佔。也就是說，將對外貿易集中由幕府管理，實施官營化制度。

相對的，清初雖鼓勵商人出洋辦銅，辦銅方式最初是順治、康熙年間的關差

10 參看矢野仁一，《長崎市史・通交貿易編東洋諸國部》，頁 215-224；山脇悌二郎，《長崎の唐人貿易》，頁 75-81；長崎縣史編集委員會，《長崎縣史・對外交渉編》（東京：吉川弘文館，1986），頁 512-514。

11 參看山脇悌二郎，《長崎の唐人貿易》，頁 99-101；太田勝也，《鎖國時代長崎貿易史の研究》，頁 345-363。

12 參看劉序楓，〈清康熙～乾隆年間洋銅的進口與流通問題〉，頁 138-139。

辦銅，即按配額分配給內地各稅關的關差負責採辦，關差再委託出洋商人採買。但因辦銅效率不彰，弊端叢生，自康熙三十八年（1699）起改由各關支銀交內務府商人承辦。商人辦銅為商人由各關支領辦銅銀，再將採購的額銅解送京局鼓鑄。十四關之採辦額 358 萬 1160 斤，自康熙三十九年起全改由商人王綱明、張鼎臣及曹寅、曹荃兄弟等九人承辦。¹³ 康熙四十二年（1703）因制錢加重至一錢四分，需銅甚多，再動支長蘆、山東、兩淮、河東、兩浙等地鹽課銀，四十四年（1705）、五十二年（1713）另加福建、廣東鹽課及海關銀增辦銅斤，此時亦皆由內務府商人承辦。銅價百斤官給 10 兩，腳價 5 兩，而商人實際買銅只用 7 兩，加運費及雜費 3 兩，計 10 兩，比日本之輸出價及市價均低，剩餘的 5 兩中 1.1 兩為給稅關監督的「盤纏銀」，3.9 兩為「節省銀」上繳內庫，¹⁴ 對商人來說辦銅幾乎無利可言，只有靠銅以外貨物之利來彌補損失，或是靠預發之銅本息取利，或是投資其他事業。最重要的是可藉節省、盤纏銀等之上納，與皇室及各關監督建立良好關係，以獲得其他特權。

由於 1699 年以後日本銅產減少，對康熙帝的錢法改革及清朝社會經濟造成重大影響，即便是改由皇室親信的內務府商人辦銅，亦無法購足國內所需銅額。¹⁵ 為確認日本國內和長崎貿易的情況，康熙三十九年（1700）十一月密令蘇州織造李煦，¹⁶「三處織造會議一人往東洋去」，並特別指示「千萬不可露出形跡方好」。四十年（1701）在江南三處織造（江寧織造曹寅、杭州織造敖福合、¹⁷ 蘇州織造李

13 故宮博物院明清檔案部編，《關於江寧織造曹家檔案史料》（北京：中華書局，1975），康熙四十年五月二十三日〈內務府題請將湖口等十四關銅觔分別交與張鼎臣王綱明曹寅等經營本〉，頁 15-20。

14 故宮博物院明清檔案部編，《關於江寧織造曹家檔案史料》，康熙四十八年六月四日〈內務府奏議覆五關銅觔仍交各關監督接辦摺〉，頁 71-72。

15 康熙四十年代起每年官定鼓鑄銅額就已超過四百萬斤，1715 年起定為 443 萬餘斤。參看劉序楓，〈清康熙～乾隆年間洋銅的進口與流通問題〉，頁 137，附表 1。

16 李煦（1655-1729），內務府滿洲正白旗人，祖先為漢人，父李士楨曾任廣東巡撫。康熙三十二年（1693）李煦出任蘇州織造，與妹夫江寧織造曹寅，深受康熙帝信任。雍正二年（1724），因虧空公家銀三十八萬兩，被抄家籍產，後被發配黑龍江而死。參看王利器編，《李士楨李煦父子年譜：紅樓夢與清初史料鉤玄》（北京：北京出版，1983）。

17 敖福合（?-1706），漢名金依仁，康熙三十一年至四十五年（1692-1706）接其父金遇知後，任杭州織造。與李煦、曹寅有姻親關係。參看嵇曾筠等監修，雍正《浙江通志》，卷 121，職官，織造府，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商務印書館，1983-1986，據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清乾隆四十七年文淵閣本影印），冊 522，頁 238；黃一農，〈江南三織造所織出的曹家姻親網絡〉，《曹雪芹研究》，2014 年 3 期，頁 10-25。

熙)的精心安排下,杭州織造的烏林達莫爾森,¹⁸於六月初避開商舶往來頻繁的寧波,秘密從赴日船隻較少的上海出發赴長崎,十月初六返航寧波,隨經杭州、蘇州,十六日即進京覆命。¹⁹

康熙帝命親信赴日探聽情報的目的,以及烏林達莫爾森返國後,究竟向康熙帝報告了什麼內容,目前無史料可確認。但之後的雍正帝曾言:「當年聖祖亦曾風聞此事,特遣織造烏林大麥而森假辦商人往彼日本探聽,回總言些假捏虛奉之詞,極言其恭順懦弱。此後隨不介意,而開洋之舉,亦由此起。」²⁰即據莫爾森調查的結果,中國風聞之日本情報,多為虛構無實之消息,強調日本對中國極為「恭順懦弱」,無庸擔心。因此,才会有「開洋之舉」。此處之「開洋」應非指1684年的開海禁,合理解釋為允許繼續對日本貿易。但這又與清朝所需的銅材息息相關,乃是不得已的選擇。此事在康熙帝的言論中亦有透露些許資訊。康熙五十四年(1715)日本實施「正德新例」,對中國貿易船數及輸出銅數設限,並發行「信牌」(長崎通商照票),無信牌者不許貿易。商人們為取得信牌而發生爭訟事件。康熙帝為顧及國計民生,確保日本銅的穩定進口,批准商人持用記有日本年號的信牌,允許繼續貿易。在對臣下的指示中,康熙曾言:「朕曾遣織造人過海觀彼貿易,其先貿易之銀甚多,後來漸少。」²¹表示康熙帝關心的仍是對日貿易的問題,加上日本實施「鎖國」,又無侵略中國的野心,與雍正時期的關係緊張情況不同。

(三) 曹寅與〈海洋清晏圖〉

承續以上敘述,康熙年間由中國畫師所繪的〈海洋清晏圖〉,與1701年康熙

18 烏林達,為滿語 *ulin i da* 之漢字,又做烏林大,屬織造下屬未入流的小官。據乾隆刊《御製增訂清文鑒》,烏林為「財貨」,烏林達是「司庫」,烏林人是「庫使」之意。參看河內良弘編,《滿洲語辭典》(京都:松香堂書店,2014),頁1135。又,(清)呂燕昭修,姚鼐纂,(嘉慶)《新修江寧府志》,卷19,秩官:「督理織造一員,無常品,例以內務官員為之,駐江寧。司庫一員正七品,筆帖式二員七品,庫使二員正八品。烏林大一員,未入流。」(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續修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據清嘉慶十六年刊本影印),冊695,頁224。)

19 故宮博物院明清檔案部編,《李煦奏摺》(北京:中華書局,1976),康熙四十年三月〈與曹寅等議得杭州織造烏林達莫爾森可去東洋摺〉;康熙四十年六月〈莫爾森已從上海出洋摺〉;康熙四十年十月〈莫爾森出洋已回現已由蘇州進京摺〉,頁15-19。康熙帝並特別在四十年六月的〈莫爾森已從上海出洋摺〉後,硃批提示「回到日即速報」,顯示其對此事的重視。

20 國立故宮博物院編,《宮中檔雍正朝奏摺》(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1978),輯11,雍正帝對雍正六年八月八日浙江總督管巡撫事李衛奏摺的硃批,頁56。

21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整理,《康熙起居注》(北京:中華書局,1984),冊3,五十五年九月二日條,頁2302-2303。相關研究亦可參看岩井茂樹,〈清代の互市と「沈黙外交」〉,頁358-377。

帝命江南三織造派遣親信赴日探聽情報應有相當大的關連。目前雖未見其他具體文字紀錄，但在三織造之一江寧織造曹寅的自撰藏書目錄《棟亭書目》，卷二「地輿」的分類項目下，著錄有「海洋清晏圖，有匣」的圖卷，²² 被分類為地輿圖，與前述清宮舊藏的〈海洋清晏圖〉同名，二圖應有相當大關連，極有可能是同一圖卷。而此圖卷的存在，不僅在時間上，在人脈上都正好印證烏林達莫爾森赴日探聽情報的行動。莫爾森 1701 年十月返國後，經由蘇州匆忙趕赴京師覆命，不可能短時間製作此長大精細的畫卷，並攜入宮中。推測是返回江南後，奉曹寅之命整理所收集的底稿資料，請畫師製作的。而這畫卷就留在曹寅之處，成為他的收藏。康熙五十一年（1712）曹寅死後，或是其家（繼子曹頌）雍正六年（1728）被查抄後畫卷流入宮中，亦有可能是在生前就呈進宮中，目前無法確認。²³

曹寅（1658-1712），字子清，又字棟亭，號荔軒。是《紅樓夢》作者曹雪芹的祖父，深得康熙寵信，康熙二十九年（1690）任蘇州織造，三十一年轉任江寧織造，兼領兩淮巡鹽御史。以文學著稱，不僅擅於詩詞、戲曲，也是知名的藏書家。²⁴ 如眾所知，織造一職，表面上看起來是由內務府直接派遣的官僚，監督絲絹產品的製造，以供應皇室需求，實則是為皇帝打探江南各省政治、經濟動向，並以密摺隨時奏報皇帝。²⁵ 由於長期擔任江寧織造，同時又承攬採購日本銅的工作，使他有許多機會接觸外來事物，包括日本的各種資訊與文物，並曾以「倭語」（寄語）填曲，²⁶ 創作〈日本燈詞〉之雜劇，可知他對日本事物有相當程度的關心與瞭解。²⁷

〈海洋清晏圖〉之後進入宮中收藏，在清宮內務府造辦處的《活計檔》中有見記載。乾隆二十五年（1760）十一月二十三日奉乾隆旨諭：「著輿圖房查有祥瑞各

22 (清)曹寅，《棟亭書目》，卷2，21b，收入《遼海叢書》（瀋陽：遼瀋書社，1985，據遼海書社民國二十三年排印本影印），頁2643。

23 當然也不能排除另製作複本的可能性，但其內容應是相同的。

24 可參看史景遷（Jonathan D. Spence），溫洽溢譯，《曹寅與康熙：一個皇帝寵臣的生涯揭秘》（Ts'ao Yin and the K'ang-hsi Emperor）（臺北：時報文化，2012）；方曉偉，《曹寅評傳年譜》（揚州：廣陵書社，2010）。

25 田仲一成，〈清代蘇州織造と江南俳優ギルド〉，《東方學》，35輯（1968.1），頁2；史景遷，《曹寅與康熙：一個皇帝寵臣的生涯揭秘》，頁239-282。

26 寄語，即古代以漢字記錄的日語譯音。

27 唐權，〈“倭語”之戲：曹寅《日本燈詞》研究〉，《清華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3年2期，頁52-65。

圖呈覽。」十一月二十九日條則紀錄：「郎中白世秀、員外郎金輝將輿圖房收〈海洋清晏〉手卷圖一卷，持進交太監胡世傑呈覽。奉旨：將此圖留下，其輿圖房所有收貯輿圖，陸續預備呈覽。欽此。」²⁸接著，乾隆帝就命造辦處，將內府輿圖房所藏輿圖整理分類，翌年（1761），彙整編目成《蘿圖薈萃》呈覽；乾隆六十年（1795）再增補陸續進呈及繪製的輿圖，按前分類彙整為《蘿圖薈萃續》，總計二種目錄共收圖 1129 件。²⁹也就是說，至少在乾隆二十五年以前〈海洋清晏圖〉就已存在宮中內務府的輿圖房內。

在嘉慶朝編輯的《國朝宮史續編》（1806）輿圖目錄內仍可確認其存在清宮內。但至清亡後，1936 年北平故宮博物院文獻館整理出版的《清內務府造辦處輿圖房圖目初編》中已不見此圖卷的蹤影。³⁰可確定的是，在 1916 年之前此圖已透過在東京經營漢籍書店的文章堂主人田中慶太郎（1880-1951）之手流至日本，³¹後入藏於東京帝國大學圖書館。至於確切時間，以及入藏於東京帝國大學的管道和經緯，在該校的藏書目錄中完全不見著錄。³²此圖卷似乎只在 1916 年底的史學會大會，³³和 1918 年 5 月的長崎縣立圖書館及 1923 年 5 月的東京帝國大學史料編纂掛公开展示過，1923 年 9 月 1 日因關東大地震，東京帝大圖書館全毀，〈海洋清

28 轉引自秦國經、劉若芳，〈清朝輿圖的繪製與管理〉，收入曹婉如等編，《中國古代地圖集（清代）》（北京：文物出版社，1997），頁 74；劉若芳，〈清宮輿圖房的設立及其管理〉，收入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明清檔案與歷史研究論文集：慶祝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成立 70 週年》（北京：中國友誼出版社，2000），頁 1286。

29 秦國經、劉若芳，〈清朝輿圖的繪製與管理〉，頁 75-77；劉若芳，〈清宮輿圖房的設立及其管理〉，頁 1288-1293；承志，〈ダイチン・ゲルンとその時代：帝國の形成と八旗社會〉（名古屋：名古屋大學出版會，2009），頁 252-254。

30 國立北平故宮博物院文獻館編，《清內務府造辦處輿圖房圖目初編》（北平：國立北平故宮博物院文獻館，1936）。此目錄分類大致參照乾隆《蘿圖薈萃》舊目略加調整，別為輿地、都城宮苑、風土、江海、河渠、武功、巡幸、名勝、瑞應、效貢、寺廟、山陵、風水等十三類，並附圖目一類於後。但在原分類的「江海」項下，已不見此圖卷。

31 參看稻葉君山，〈海洋清晏圖と日章旗〉，《日本及日本人》，697 號（1917.1），頁 99。稻葉本人於 1916 年末史學會大會展示時親見此圖，並據文章堂主人田中慶太郎之言，此圖由北京攜來，原係內府御物。

32 遍查自明治 21 年（1888）至大正 7 年（1918）年間《東京帝國大學附屬圖書館和漢書書名目錄》（增加 1-2）和《東京帝國大學附屬圖書館增加圖書月報》，及明治 40 年（1907）8 月整理的《東京帝國大學附屬圖書館別置貴重・珍書目錄》完全未見著錄。依時間推斷，此圖卷應是在 1916 年末史學會大會展示後，1917 年間入藏於東大圖書館，1918 年 5 月再借展至長崎縣立圖書館的。

33 稻葉君山，〈海洋清晏圖と日章旗〉，頁 99；內田魯庵，〈典籍の廢墟〉，收入《內田魯庵全集》，第 8 卷（東京：ゆまに書房，1987），頁 321-322。

晏圖〉亦毀於此次震災中。³⁴ 現在僅能由當時的珂羅版照片，依稀看出原圖精細絢麗的影像。

此圖卷以俯瞰視角，用工筆豔彩，生動而細緻地描繪了康熙年間上海黃浦江口、上海縣城周圍的自然和人文地理景觀，如海關以及相關船隻的圖像；而對長崎的描繪更加精細，進入長崎灣後，對兩岸的砲台、官方建築及灣內的船隻，如圖中所貼榜題文字所記，可辨識者如「王船」（奉行所船）、「報船」、「通事船」、「紅毛船」、「鳥船」（中國尖底船）、「沙船」（中國平底船）等，長崎港內的「紅毛館」（出島荷蘭商館）、「王府」（奉行所）、「住庫」（唐館）、中國人所創建的寺廟「南京寺」、「漳州寺」、「福州寺」（文字標示位置有誤）等相關建築也都被標示，顯然是費了不少時間觀察，當然，也有可能參考到日本人的圖像。如此圖與成立於 1670 年代的〈寬文長崎圖屏風〉（圖 2，長崎歷史文化博物館藏）及 1680 年代的〈長崎鳥瞰圖屏風〉（圖 3，神戶市立博物館藏）的構圖類似，均是由唐館對岸的稻佐山，以俯瞰的角度描繪長崎港的景象。在 1689 年以後赴日中國人被強制居住於唐館內，不許自由外出的情況下，除非參考既有繪圖，否則難以繪製如此精細的圖像。由此圖名〈海洋清晏圖〉所示，畫家及清朝官方（或是曹寅）想要表達的是中日間安定和平的貿易景象，這也反映了康熙帝積極開放與日本貿易的時代背景。

（四）〈海洋清晏圖〉與〈琉球國圖〉

〈海洋清晏圖〉1923 年燬於關東大地震，但近年在廣島縣立歷史博物館寄託的文物中發現一件名為〈琉球國圖〉的畫卷，作者署名焦秉貞，³⁵ 由本畫卷末「琉球國圖，臣焦秉貞謹繪」的落款及「秉」、「貞」鈐印（圖 4），此畫卷應是呈給皇帝觀賞之物，但未見清朝宮中有相關紀錄，也未見題跋和其他鈐印。而且，題名「琉球國圖」明顯與畫卷內容不符。同時代冊封琉球的使節中，康熙二十一年（1682）出使的汪楫和康熙五十五年（1716）出使的徐葆光，都有留下冊封紀

34 內務省社會局編，《大正震災志》下（東京：內務省社會局，1926），頁 735。東京帝國大學書館燒失的重要美術品清單中有「〈海洋清晏圖〉（清朝初期の畫）」之記載。

35 廣島縣立歷史博物館藏之「守屋壽古地圖コレクション」，感謝東京大學渡邊美季教授的告知，以及該館主任學藝員久下實先生提供圖像檔。焦秉貞為清康熙時期的宮廷畫家，生卒年不詳，活躍於康熙中期至雍正前期，康熙時官欽天監正，供奉內廷。擅畫人物，吸收西洋畫法，重明暗，樓臺界畫，刻劃精工，繪有〈仕女圖〉、〈耕織圖〉等。參看（清）趙爾巽等撰，《清史稿》（北京：中華書局，1977），卷 504，列傳 291，頁 13911。

錄，³⁶ 徐葆光在返國後蒙康熙帝召見，康熙五十九年（1720）在熱河避暑山莊進呈彩色的《冊封琉球圖本》二冊，題簽分別為〈冊封全圖〉和〈琉球全圖〉，裝訂成冊，右圖左文，對航海、冊封過程和琉球的山川、物產有詳細介紹。³⁷ 焦秉貞身為宮中的畫師不可能犯此嚴重錯誤，且他並無隨從出使紀錄，因此，〈琉球國圖〉極有可能是後人的仿作，再冠以焦秉貞名。以本圖卷清楚詳細對長崎港景象的描繪，〈琉球國圖〉應有其他參照臨摹的原本存在。

細觀本圖內容，為細緻豔彩之青綠山水，長寬尺寸 52.7×822.2 公分，絹本，與〈海洋清晏圖〉所繪圖像幾乎完全相同，但經仔細比對，〈琉球國圖〉缺榜題文字說明，且人物、船隻、建築物等內容亦有省略，精細程度略遜於〈海洋清晏圖〉，加上長崎港內荷蘭船旗幟顏色的順序有誤等，可以斷定〈琉球國圖〉應該是〈海洋清晏圖〉的摹本（圖 5）。

〈琉球國圖〉的來歷不詳，並非清宮舊藏，由其裝裱推測是在中國所摹製，製做背景與〈海洋清晏圖〉原所有者文求堂田中慶太郎應有極大關連。田中慶太郎在 1900 年以後經常往來中國，進口中國古書、字畫、古董等，1908-1911 在中國居住三年，收集珍書善本，並與中日兩國官僚、文人交流往來，拓展其事業網絡。³⁸ 除〈海洋清晏圖〉外，另持有許多中國古代名家字畫，如焦秉貞所繪之〈康熙南巡圖〉（題簽：「南巡蘇州虎丘行宮圖卷」）亦為其中之一，圖中有內藤虎（虎次郎，湖南）、長尾甲（雨山）大正六年（1917）之題跋與羅振玉宣統丙辰（1916）年的題簽，跋中有云，此圖係「燕京庚子（1900）亂，出自彼國內廷，流傳我邦者。」³⁹ 因義和團戰亂而流出，〈海洋清晏圖〉亦有可能是經由同樣管道，

36 汪楫著有《使琉球雜錄》、《中山沿革志》（均為 1684 年序刊）；徐葆光著有《中山傳信錄》（1721 年刊本）。參看夫馬進編，《增訂使琉球錄解題及び研究》（宜野灣：榕樹書林，1999），頁 79-105。

37 參看孫欲容，〈徐葆光《琉球國貢全圖》與清代琉球形象的建構〉，《中國文哲研究通訊》，26 卷 1 期（2016.3），頁 61-81；麻生伸一、茂木仁史編，《冊封琉球全圖：一七一九年的御取り持ち》（東京：雄山閣，2020）。

38 李慶國，〈郭沫若と文求堂主人田中慶太郎〉，《アジア文化學科年報》，8 號（2005.11），頁 49-60；田中壯吉編，《日中友好的先驅者「文求堂」主人田中慶太郎》（東京：極東物産，1991）。

39 稻葉君山，〈海洋清晏圖と日章旗〉，頁 99。稻葉文中所見〈乾隆南巡圖〉，應是〈康熙南巡圖〉之誤，可參看原田尾山，《日本現在支那名畫目錄》（東京：大塚巧藝社，1938），頁 294。此圖卷後由當時的政治兼實業家，亦為知名藝術品藏家山本悌二郎（1870-1937）收藏，其後再流出，參看 2007 年 12 月 15 日北京瀚海拍賣會及 2009 年 5 月 26 日香港佳士得（Christie's）拍賣之簡介。焦秉貞，〈南巡蘇州虎丘行宮圖卷〉，卓克藝術網，<http://auction.zhuokearts.com/>

或同時入手的。在入手同時並製作摹本，以同時代的宮廷繪師焦秉貞之名，並加圖名為〈琉球國圖〉，或欲另謀利益，⁴⁰ 由於持有者守屋壽購得此圖卷的來歷不明，無法得知詳細傳承，有待後續再考。至少可確認〈琉球國圖〉為〈海洋清晏圖〉之摹本。透過原本榜題文字與摹本彩色圖像之比對，以及同時代日本人繪製的長崎圖像，可得知相關景物的差異。如前述榜題文字與日本名稱，另外，船隻、建築物及地景的異同等，對當時清朝對日本的認識，中日間海上航路與長崎港周遭的地理、防衛、建築配置等的研究大有助益。

茲舉一例，如圖 1 長崎港山腰描繪之三座「唐寺」，即中國人所建的「南京寺」（興福寺）、「漳州寺」（福濟寺）、「福州寺」（崇福寺），原本有文字標示出其位置，但因圖像模糊，無法辨識建築物的差異，透過摹本的彩圖，可清楚看出中國寺廟山門前都豎有兩座紅色旗杆，包括在唐館內的土地廟，以與其他建築物區別。唯其中標示「漳州寺」的建築卻未見旗杆，且所在位置亦有錯誤，榜題明顯將漳州寺與福州寺的位置標示錯誤，最左邊標示的福州寺應為漳州寺，而福州寺的正確位置應更靠近唐館（圖 6）。三座寺廟只有南京寺的位置標示正確，或許如後文所述，與此圖卷繪製者的出身地有關，南京寺為江浙商人的菩提寺，停留長崎期間，奉祀船神媽祖像和相關祭禮儀式時，常有機會赴各自鄉貫所屬的寺廟，因此清楚所在位置。

另外，有關清康熙開海後，上海海關所在地的問題，學界有不同討論，⁴¹ 透過〈海洋清晏圖〉及摹本的圖像和文字，可得知康熙四十年代江海關及衙署所在地確是在縣城小東門（即寶帶門）外的黃浦江邊。圖像中海關附近幡旗林立，加上江邊停泊的船隻和文字說明，更可印證此一事實（圖 7）。對此圖卷的研究，仍有不少值得探討的餘地，特別是以繪畫史觀點的研究，因非本文主旨所在，且非筆者專業所及，有待不同領域方家繼續深入探討。

art/26510911.shtml（檢索日期：2022 年 3 月 1 日）；焦秉貞，〈康熙南巡圖卷〉，雅昌藝術網，<https://auction.artron.net/paimai-art58781265>（檢索日期：2022 年 3 月 1 日）。

40 〈南巡蘇州虎丘行宮圖卷〉，據長尾甲跋文，認為該畫在庚子之亂中流出宮廷，後流散到日本。畫中鈐有「雍正御覽之寶」印外，另有「鶴巢清玩」等藏印，鶴巢或為沈鶴巢，清末民初嶺南畫家，可推知該畫流出清宮之後，曾在國內流傳了一段時間，才轉至田中慶太郎之手而流入日本。〈海洋清晏圖〉也有可能是經由其他收藏者轉手後，再至田中之手。因此，〈琉球國圖〉也有可能是前收藏者所製作的摹本。

41 參看黃國盛，《鴉片戰爭前的東南四省海關》（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0），頁 28-38。

三、〈長崎貿易圖〉與〈崎陽唐館交易圖〉

(一) 〈長崎貿易圖〉的製作背景與內容

〈海洋清晏圖〉外，另一件與康熙年間調查日本活動有密切關係的圖像為現藏於國立故宮博物院的〈長崎貿易圖〉（圖8），由八張冊頁所組成，每張頁面又分為右圖左文二部分，共有16頁，每頁35.8×28.2公分。將當時長崎貿易活動流程，依1.「起貨」、2.「南京寺」、3.「王取貨」、4.「丟票」、5.「出貨」、6.「開漆器店」、7.「唱戲」及8.「看會」之順序，⁴²描繪了從唐船抵港到交易完成的重要環節，圖像配合文字說明，對當時長崎貿易情況和日本風俗的理解有相當大的幫助。⁴³

〈長崎貿易圖〉最早的紀錄，是被收錄在乾隆二十六年（1761）編製的內務府造辦處輿圖房目錄《蘿圖薈萃》的「江海」項內，⁴⁴之後也被收入乾隆收藏的《石渠寶笈三編》〈御書房藏四〉內。⁴⁵題名：「無名氏畫長崎貿易圖一冊」，有略述上開的八個貿易流程標題，右邊圖為絹本，左邊書為黃箋本，但內容則「文俚不錄」。顯然非宮中畫師所繪，極有可能是由地方官所進呈者。末頁「看會」的冊頁中並蓋有「三希堂精鑑璽」和「宜子孫」二方鈐印及「嘉慶鑑賞」圓印，頁首的「起貨」圖另有「嘉慶御覽之寶」的方印和「石渠寶笈」、「寶笈三編」之印，「南京寺」的頁面另蓋有「宣統御覽之寶」鑑賞印，嘉慶年間的《國朝宮史續編》也有著錄此圖。⁴⁶

本圖冊主要內容為介紹中國商人到長崎進行貿易的流程。應該是應清朝官方

42 〈長崎貿易圖〉之排列順序有錯誤，將3.「王取貨」與4.「丟票」，以及5.「出貨」與6.「開漆器店」順序錯置，此排列順序是依照後述另一版本，京都大學附屬圖書館藏〈崎陽唐館交易圖〉的順序，詳如後述。

43 有關此圖冊，朱龍興以建築及藝術史角度已有數篇相關文章介紹，值得參考處不少。本文以不同觀點，討論此圖的貿易流程，並推測其製作的年代及背景，並與京都大學藏〈崎陽唐館交易圖〉比較。參看朱龍興，〈《長崎貿易圖冊》初探〉，《故宮文物月刊》，335期（2011.2），頁106-113；朱龍興，〈視野的轉換——院藏《長崎貿易圖冊》所見的日本祭典〉，《故宮文物月刊》，389期（2015.11），頁94-107；朱龍興，〈東瀛華蹤——《長崎貿易圖冊》中的華人住所〉，《故宮文物月刊》，404期（2016.8），頁72-85。

44 汪前進選編，《中國地圖學史研究文獻集成》，冊5，頁1879。

45 （清）英和等輯，《欽定石渠寶笈三編》〈御書房藏四〉，收入《續修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2002，據清嘉慶內府抄本影印），冊1079，頁396。

46 （清）慶桂等輯，《國朝宮史續編》，卷100，頁23b。

要求，以圖文對照的方式，簡單明瞭的介紹。全八圖中以俯視角度描繪，建築物則以界畫方式，整齊排列，使得各種貿易活動皆可盡收觀看者眼底。圖中不見任何中國人，文中對日本亦以「倭子」稱呼，更說明此圖冊的製作者為中國人。以下簡單介紹圖冊中各流程。

首先是「起貨」，本文如下：

船至長崎收口，拋碇，遂有頭目率領通事、財副、人夫上船，照冊查點，一應貨物登岸堆置庫樓內，如有不在冊內者，即作私貨，不准發賣，封固收庫，俟回船日一併發還。

唐船入港後，長崎奉行所官員帶領通事及相關人員上船，按貨冊清點貨物，無問題者以小船搬上岸上之倉庫收存。若有未登冊之貨，則不許販賣，亦封存收入倉庫，待回國時再發還帶回。此處的「庫樓」應是指 1702 年完工啓用的「新地」倉庫，隨身用品外，禁止商人將貨物攜入唐館內，以防止走私貿易。

接著為「南京寺」的敘述：

一切貿易船隻俱供天妃神像，起貨完日，在船客商將神像擡送南京寺祭祀，聽眾商在寺遊玩一日，回庫居住。大門口有插刀手看守，二門外有通事、街官坐班，在庫客商只許二門外行走，不准出大門，防守甚嚴。

起貨之後，船員下船。先將船中供奉的媽祖等神像抬送到南京寺（即三江幫的興福寺）內供奉。允許商人們在寺內參觀一天，之後得返回唐館居住。館內警備森嚴，大門口有帶刀之守衛，中門（二門）口有通事和日本街官值班看守，唐商最多只允許到中門外活動，嚴禁出大門。

商人貨物存庫，入館安頓後，接著為「王取貨」：

將庫內堆置貨物一槩運至王府，其府內有倭子，專看緞紗紬綾絲綿褐子氈條雜貨藥材等物，選上色者呈閱土王，其欲取者取之，俟他貨定價後，隨眾發價。

將唐船帶來之貨物，絲綢織品或藥材、雜貨等，選質量好的送至王府（奉行所），由奉行所官員先挑選所需的購買，這些並不在限定貿易額之內（圖 9）。其餘貨品待估價後，由日本商人購買。

之後進行下一階段的「丟票」手續：

將諸色貨物各取一箱送至館內，日本京客齊集一處，相傳看估，各寫帑票，逐一闡定，遂有應值財副開闡看價，以其價高者定價焉。

將各種貨物各取一箱當作樣品，送至唐館大門二門間廣場的投標所「札場」，讓日本各地來的商人齊聚看貨估價。接著在紙票記入欲購買之價格，最後交由輪值的官員開封看價，由出價最高者得標。

當貨物競標賣出後，接著是「出貨」：

日本無全買之例，量船之多寡派賣分數，丟票定價後，問客商將願賣之貨，令本商同頭目、通事開庫稱發，餘者存庫。俟完日，將買就紅銅、洋漆、海參、鰻魚等件併餘存貨物，俱送下船，惟恐偷賣，仍令伴船看守，候風順開行。

日本商人得標之貨物，需再和唐商確認，是否願意按價出售。在日方規定的貿易額內，願意出售者，則會同日本官員、通事一起至新地倉庫秤量出貨，其餘貨品依舊存庫，待貿易結束，連同購買的回貨如紅銅、洋漆（漆器）、海產品等一起裝船帶回國。

唐商貨物售出後，接著購買回貨，「開漆器店」的敘述如下：

丟票、出貨後，在館內開洋漆、銅器店數日，聽憑客商置買。將某船某商置買何物，登簿記訖，算明價值，（抵）除所賣貨物之價。倭國銀錢概不許帶往別國，搜檢甚嚴。

所購買的回貨，除固定限額的銅及海產外，餘額還可購買一些日本漆器（蒔繪）、銅器等雜貨。日方會在唐館中門廣場開設漆器、銅器及相關雜貨之商店、攤位數日，供客商挑選登記，採購回國（圖 10）。計價則是在每船售出貨品的總銀額內，扣除居留期間的開銷，所餘再購買日本商品，而非以現銀支付，基本上可說是以貨易貨之求償貿易方式。⁴⁷

以上是〈長崎貿易圖〉冊對長崎貿易流程簡要的介紹，計分為 1.「起貨」、2.「南京寺」、3.「王取貨」、4.「丟票」、5.「出貨」、6.「開漆器店」等六個階段，但實際情況更為複雜。乾隆中期數次赴日的文人兼商人汪鵬，在其所著〈袖海

47 劉序楓，〈論清代的中日貿易與貿易結帳方式〉，《淡江史學》，10 期（1999.6），頁 195-201。

編〉內，對長崎貿易情況及唐館生活有詳細描述。⁴⁸ 唐船入港起貨後，接著為「清庫」，也稱為「清貨」，長崎會所官員會同唐船主等清點貨品種類、數量、斤兩及評定等級，作成貨物帳冊。以上手續結束後，再來為「看貨」，〈袖海編〉內稱之為「插番」，「司事人領本國遠商開庫視貨貨之高低」，讓日本商人進貨庫確認貨品的內容和質量高低。接著就是「講價」，中國商人與長崎會所之官員就各貨件的樣品分別講價登簿，合則賣，不合則原船載回。講價結束後，所有貨品均歸長崎會所。會所再經投標（即「丟票」）等手續，標售給日本商人。如〈袖海編〉所述：

講價已定，本國商人咸集於會館看板，則知某貨共有若干，其貨之優劣，前於插番時見之矣。看板後，各商書其所值之價，密封投櫃，名曰丟票，然後擇善價而售之，不勞較論，亦交易之良法也。

接著是「出貨」，將新地貨庫的貨品搬出給各個得標的商人。中國船商品售出後，然後才是「開漆器店」，購買漆器、銅器及雜貨等回貨，最後將各船配額之銅和購買的海產品裝船。⁴⁹

所有交易結束後則開始對帳。唐船售出貨品的總價銀，扣除船員在日期間的所有開銷，包括船隻修理、付日方搬運人夫費用、伙食生活費後，才用來購買銅、海產、雜貨等回貨。對帳為各船分別進行，一切無誤後，則準備歸國。

在正規貿易活動外，商人也應日方邀請參加一些特別慶典活動。如「唱戲」的記載：

日本神會，在王府後空地，迎面蓋供佛松棚一座，三面俱蓋席棚。是日備酒飯，請眾商於平明時至棚內坐落。戲從街巷來，每齣，先擡大木床一張，安放地中，即為壇場，然後挨班上場，或舞扇，或舞花，併草帽、花籃等物，齊聲唱舞。

48（清）汪鵬，〈袖海編〉，收入《小方壺齋輿地叢鈔·第10帙》，頁269b-273a。

49（清）汪鵬，〈袖海編〉，收入《小方壺齋輿地叢鈔·第10帙》，頁269b、270a。汪鵬記述的年代是乾隆29年（1764），但日本在在1715年實施「正德新例」的貿易改革後，將原本中國商人與日本商人可直接在唐館進行面對面交易的「丟票」競標方式，改為由官方設立的長崎會所先以議價方式向中國商人整批購入，再以競標方式標售給日本國內商人，與〈長崎貿易圖〉記載的「丟票」方式不同。有關長崎貿易的流程，可參看劉序楓，〈德川「鎖國」體制下的中日貿易：以長崎「唐館」為中心的考察（1689-1868）〉，收入海洋史叢書編輯委員會編，《港口城市與貿易網絡》（臺北：中央研究院人社中心，2012），頁100-103。

這是描寫長崎諏訪神社每年農曆九月七日至九日的祭典活動，稱之為「長崎くんち」，地點在港邊的長崎奉行所西役所後方廣場——「大波戸」。屆時會搭棚，備酒飯，邀請唐商和荷蘭人觀賞。每年由長崎不同的町輪流負責，各町都有不同的表演節目。

表演活動結束後，接著是各町表演隊伍遊行繞境活動。「看會」的記載如下：

此殺思馬之會也。其人背上俱馱紙糊龜蓋，中穿高杆一根，長丈餘，或做米包、布機、酒盃、受八哥（即攢盒也）、海參、鰻魚、墨魚、油魚等物於上，胸前掛鼓一面，團團轉走，擗打數次，挨班而去，別齣再上演之。

這段記載也是對長崎諏訪神社祭典的描述，「殺思馬之會」，「殺思馬」即「薩摩」（さつま，Satsuma）的日文發音，指圖冊所繪表演的場景正是「大薩摩踊」，表演者穿著裝扮如龜殼的「母衣」（ほろ，horo），長杆上掛各種裝飾物品如酒杯、墨魚、海參等，各隊伍打著鼓繞圈輪流表演。⁵⁰

以上為〈長崎貿易圖〉八幅圖文的內容。唐船從入港後到回國為止的停留期間，短則約三個月，長則超過一年。這段期間需處理的事務相當多，此圖冊只是介紹一些重要項目。至於最後的「唱戲」和「看會」應該是在貿易活動外，為了介紹日本特殊風俗習慣給清朝官員，因而特別繪製的。

（二）〈崎陽唐館交易圖〉（圖 11）

故宮收藏的〈長崎貿易圖〉之外，京都大學另藏一件題名為〈崎陽唐館交易圖〉（白絹本，筆者不詳），由八張冊頁所組成，每張頁面又分為右圖左文二部分，⁵¹ 每頁尺寸 31.7×30 公分，與故宮〈長崎貿易圖〉相較，略呈方形，裝裱亦為中式裝裱，依外觀看，應非近代的製作。⁵² 封面無題，原圖冊為內藤湖南於 1924

50 「母衣」是日本古代騎兵用的一種布幔護具，在騎馬時穿著會被風鼓起而膨脹，如龜殼般，有防流失的功能。參看久留島浩、原田博二、河野謙解說，《秘藏！長崎くんち繪卷：大阪府立中之島圖書館所藏繪卷・崎陽諏訪明神祭祀圖》（長崎：長崎文獻社，2006），頁 31-32 之圖版。

51 原本京都大學附屬圖書館藏，參看京都大學貴重資料デジタルアーカイブ，〈崎陽唐館交易圖〉，<https://rmda.kulib.kyoto-u.ac.jp/item/rb00013549>（檢索日期：2021 年 10 月 1 日）。大庭脩編，《長崎唐館圖集成》（大阪：關西大學東西學術研究所，2003），頁 60-75 有收全圖版。王振忠曾以社會史觀點介紹此圖描繪之內容，特別是中日間的文化交流、民間信仰方面。惟未提及其製作年代、背景及由來。參看王振忠，〈長崎唐館圖〉，《讀書》，2014 年 4 期，頁 146-156。

52 原本未見，本文係參看京都大學網頁公開圖檔。成澤勝嗣推測為 18 世紀中期所作。參看成澤勝嗣解說，大庭脩編，《長崎唐館圖集成》，頁 147-148。

年寄贈，標題有可能是內藤湖南後來命名的。其圖畫內容與〈長崎貿易圖〉雖基本相同，但仍有不少細部差異，有許多不見於長崎圖之景物，色彩鮮豔多樣，唯裝裱及畫面筆法較粗糙，建築物也不盡相同，也有漏畫的部分，如「起貨」中的船隻缺船帆，日本搬運人夫均未著衣。另外，圖中人物的省略甚多，衣著及容貌也簡略，不若後者精緻細膩。其他如在「唱戲」圖中的舞者，故宮本為配戴武士刀的男性，京大本則為女性，而事實上，當時崎誡訪神社祭典中跳奉納舞的確實為女性。⁵³ 另一方面，二者的圖畫排列順序也不盡相同，清宮藏的圖冊之裝裱排列順序出現錯誤，將「王取貨」與「丟票」，以及「出貨」與「開漆器店」順序錯置，京大本則正確無誤。⁵⁴ 二者敘述的文字也有些許差異，顯然京大本並非故宮本的摹本，二者另有所本之底稿，或是京大本即為清宮本的底稿？內藤湖南在清末民初數度赴中國調查，⁵⁵ 此圖極有可能於中國所獲得，詳情有待後續考察。

（三）〈長崎貿易圖〉的製作年代及作者

至於此圖的製作年代，與製作目的息息相關，清宮收藏的目錄《蘿圖薈萃》、《石渠寶笈三編》並未清楚記載，目前也未看到其他相關紀錄，但至少不會早於唐館建成的 1689 年，也不會晚於編定《蘿圖薈萃》的乾隆二十六年（1761）。更具體的年代或可從圖冊中景物和文字說明內容來推定。

唐館建成後，隨著時間的推移，經歷幾次大火及擴建，整體的外觀也跟著改變。永井規男氏以建築史的角度，參照現存唐館相關圖像史料，將唐館的構成分為前、中、後三期。前期為元日本祿二年至享保二十年（1689-1735）；中期為元文二年至天明四年（1736-1784）；後期為天明五年至明治元年（1785-1868）。⁵⁶

首先從圖像中景物來看，在「丟票」圖中顯示的唐館內部整體圖像，畫中只

53 參看朱龍興，〈視野的轉換——院藏《長崎貿易圖冊》所見的日本祭典〉，頁 100-101。

54 參看劉序楓，〈德川「鎖國」體制下的中日貿易：以長崎「唐館」為中心的考察（1689-1868）〉，頁 100-103。

55 參看內藤湖南「年譜」，收入內藤湖南，《內藤湖南全集》，第 14 卷（東京：筑摩書房，1976），頁 659-669。另外，內藤湖南與清末中國文人的交流和書畫的蒐集研究，可參看陶德民，〈もう一つの内藤湖南像——關西大學内藤文庫探索二十年〉（大阪：關西大學出版部，2021）。

56 永井規男，〈唐人屋敷——町の構成〉，收入大庭脩，《長崎唐館圖集成》，頁 207-224。另，大井昇對唐館圖的演變亦有介紹說明，大井昇，《長崎繪圖帖の世界》（長崎：長崎文獻社，2018），頁 71-87。

見中央樹叢中最早建成的「土神堂」一座廟，其後方為空地和澡堂，不見供奉船神媽祖的「天后宮」。這座廟是南京商人於 1736 年時所籌建，⁵⁷ 加上前期唐館內住屋的數量及建築分佈明顯分為三列，且較為密集，與日本現存早期圖像吻合，在大門與中門間廣場設有「札場」，也就是「丟票」所（圖 12），而與前述 1702 年左右完成的〈海洋清晏圖〉中的「唐館」景像更是類似（圖 13）。可推知此圖的年代下限不會超過 1736 年，也就是乾隆以前。⁵⁸ 與此相較，繪製於十八世紀中期以後的唐館圖，土地面積雖然增大，隨者渡日船隻的減少，館內居住建築棟數也減少，但在土神堂後方，原為水池和「風呂」（澡堂）的空地增建了天后宮以及市店等建築。大門與中門間廣場原有的「札場」消失，取代的是貨品檢查所（改場）和「牢屋」等（圖 14）。

圖像之外，配合文字說明，亦可找出一些推斷年代的蛛絲馬跡。

在「起貨」中，將貨物從唐船上以小船運至岸上的「庫樓」，圖像明顯可看出是 1702 年完成新地貨庫，與其他至長崎唐船的起貨圖像類似（圖 15）。而此唐船則為江南沿海主要航運用的平底「沙船」，這也是十八世紀中期以前長崎貿易船的特徵之一；十八世紀中期以後，隨著船隻的大型化，適合外洋航行的尖底「鳥船」成為主流。⁵⁹

另外，從「丟票」的文字說明，「將諸色貨物各取一箱送至館內，日本京客齊集一處，相傳看估……」，可知此時中國商人與日本商人可直接在唐館進行面對面交易。如前述，這是在 1715 年實施「正德新例」之前的事，商人競標的場所在唐館內的「札場」。後來因商人競標，導致物價上漲，故停止日本商人直接投標方式購入唐船商品，改為由官方設立的長崎會所先以議價方式向中國商人整批購入，再以競標方式標售給日本國內商人。⁶⁰ 之後「出貨」的說明，「日本無全買之例，量船之多寡派賣分數」，亦類似為正德新例前實施的「定額貿易」制度，超過日方規定的船數限制或貿易額後，多餘的貨物不許貿易，強制帶回。因此，〈長崎貿易

57（江戸）饒田喻義，《長崎名勝圖繪》（長崎：長崎史談會，1931），頁 205-206。

58 前引朱龍興，〈東瀛華蹤——《長崎貿易圖冊》中的華人住所〉的推斷年代亦同。

59 相關研究可參看松浦章，《清代帆船沿海航運史の研究》（大阪：關西大學出版部，2010），頁 61-72。

60 長崎縣史編集委員會，《長崎縣史・對外交渉編》（東京：吉川弘文館，1986），頁 516-517，538-541。

圖〉的年代可推測是在新地貨庫完成的 1702 年至正德新例實施前的 1715 年之間。

最後，再談此圖的繪製者問題。江戶時代在長崎由中國人建立的寺廟有三，依出身地別分為興福寺（俗稱南京寺）、福濟寺（俗稱泉州寺或漳州寺）、崇福寺（俗稱福州寺）三寺。由圖冊〈南京寺〉的文字中敘述：「一切貿易船隻俱供天妃，起貨完日，在船客商將神像抬送南京寺祭祀，聽眾商在寺遊玩一日。」只提三江幫的南京寺，且在 1736 年唐館的天后廟建成之前，江浙船中的媽祖像亦奉祀在此，可推知與江浙商人息息相關，加上圖冊首頁的「沙船」圖，更可強化此一推論。另如前述〈海洋清晏圖〉中，對三座唐人寺廟的文字和位置標示，除南京寺外，其他二座均標示錯誤，也說明了二圖的繪製者與江浙商人的關連性。

但難以理解的是，此船船尾桅杆所掛的旗幟，像是代表日本幕府船印的日丸旗（即所謂「日章旗」），⁶¹ 在江戶時代日本人繪製的唐船圖，也就是赴長崎貿易的中國船中，僅在 1670 年代的〈寬文長崎圖屏風〉內的「ばんたん」（Banten，萬丹）船尾桅杆上見到類似的旗幟。但此旗並非單純白底紅色日章，右上方另可見紅色小圓點，左邊也有紅色粗邊。更重要的是，除此旗外，主桅上還懸掛著荷蘭旗。位於爪哇島西部的萬丹，荷蘭東印度公司在此建有商館，因此，主桅上懸掛著荷蘭旗，顯示此船是由荷蘭勢力範圍赴日的華人貿易船。在當時東亞海域混亂的局勢下，船隻懸掛荷蘭國旗可加強航海安全的保障。⁶² 若此萬丹船二桅懸掛的旗幟是「日章旗」，則有可能是在入長崎港時為證明其為貿易船而掛。但同圖未見其他船隻掛有同樣旗幟，反而是在「とうねい」（東寧）船上見到懸掛青底紅日及黃紅色粗邊的船旗，類似後述中國古代的「日月旗」，與前述「萬丹船」旗屬同一類型，並非「日章旗」（圖 16）。通常船隻航海，後桅杆所掛的都是測風向的「定風旗」或是船神「媽祖」旗，〈長崎貿易圖〉中，中國畫師特別畫上「日章旗」的目的，唯一可解釋的就是強調此船是赴日本貿易之船。巧合的是，前述〈海洋清晏圖〉中所出現的所有中國貿易船，包括停泊在長崎、上海港的沙船和鳥船，船尾懸掛的也都是「日章旗」。另外，連縣城外黃浦江邊的「上海關」，亦懸掛著同樣的旗

61 日本自古就有使用「日丸旗」的紀錄，但官方正式規定運送年貢米的「廻船」必須使用白底朱丸之旗為官方船旗標誌的紀錄，則始於寬文十三年（1673）。參看法制史學會編，《德川禁令考・前集第六》（東京：創文社，1959），頁 86-87，「諸船廻漕令條」。

62 深瀬公一郎，〈十七世紀後半の長崎港における船旗の役割〉，《長崎歴史文化博物館研究紀要》，5 號（2011.3），頁 67-80。

幟（圖 17），反而是長崎港內的日本船、荷蘭船和建築物未見懸掛，說明了繪圖者欲強調的是與日本貿易有直接關連的清朝交通工具和機關設施。

或有人質疑此「日章旗」並非代表日本，在中國古代亦可見類似旗幟。如明代《三才圖會》中的「站船」及「仙船」圖中懸掛的旗；而知名的仇英〈清明上河圖〉中，除船隻桅杆和城門之外，在城邊演練場的兵士亦持有許多類似旗幟（圖 18）。但細看這些旗幟，樣式各有不同，有紅底白日、白底、黃底紅日、青底紅日（月）等，形狀則有正方、長方、三角形，多數帶彩色鑲邊，或呈鋸齒狀的火焰邊。與日本白底紅日無邊的「日章旗」並不相同。這些中國古代的旗幟，稱之為「日旗」或「月旗」，為古代儀仗旗幟之一。據《三才圖會》記載：「周官司常掌九旗之物名，其一曰日月為常。左氏曰三辰旂旗，昭其明也。……宋太祖始置日月旗各一，《天聖鹵簿圖》：日旗赤質，畫日中以雞，月旗青質，畫月中以兔。元制日旗一，青質赤火焰腳，繪日於上；月旗一，青質赤火焰腳，繪月於上。今制日旗月旗各一，俱青質黃欄，赤火焰，間彩腳，繪日以赤，繪月以白。」⁶³ 對其來歷做了簡要的說明，先秦《周禮》已見相關記載，宋太祖時正式將日月旗列入儀制，元、明、清承之，鹵簿制度大致相同，⁶⁴ 但顏色圖案略有變化。清代則為「日旗、月旗皆藍緞斜幅，不加緣。日旗繡日，內為踰鳥。月旗繡月，內為顧兔。」⁶⁵ 並非單純白底紅日，這些旗幟除使用於宮廷鹵簿鑾駕中的儀仗外，也大量使用於軍隊出征或操練的儀式上，⁶⁶ 仇英〈清明上河圖〉內的操練場見到的五顏六色各式軍旗或纛旗即為一例。而「日月旗」作為船旗使用的例子，除仇英〈清明上河圖〉和《三才圖會》的「站船」、「仙船」外，並不多見。據研究考證，《三才圖會》中部份圖像與仇英〈清明上河圖〉類似，可能有相關的淵源，⁶⁷

63 （明）王圻、王思義輯，《三才圖會》，儀制三，「日旗月旗」，收入《續修四庫全書》（據上海圖書館藏明萬曆三十五年刻本影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冊 1235，頁 265。此內容同（明）徐一夔奉敕撰，《大明集禮》（中研院傅斯年圖書館藏嘉靖九年刊本），卷 43，「日旗月旗」，頁 16a。

64 張愛麾、王煒民，〈近三十年來鹵簿制度研究綜述〉，《陰山學刊》，26 卷 2 期（2013.4），頁 79-84。

65 （清）托津等纂，《大清會典圖（嘉慶朝）》，卷 58，輿衛，頁 10a，收入《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臺北：文海出版社，1992，據清嘉慶二十三年刻本影印），輯 71，頁 1897。

66 在清代的戰功圖內也可見到不少類似旗幟，可參看丁治平，〈布朗大學圖書館藏《欽定剿平七省方略圖說》旗幟圖攷〉（2021.8），無頁碼，<https://storymaps.arcgis.com/stories/49d5d137fce94baeb28344bf7234b16>（檢索日期：2022 年 2 月 25 日）。

67 唐偉明，〈以《三才圖會》解析仇英《清明上河圖》（辛丑本）〉，收入單國霖主編，《大明古

《三才圖會》之「站船」（即官船）圖為黑白無上色，無法辨識與「日章旗」的差別。在日本江戶時代長崎奉行中川忠英編纂的《清俗紀聞》一書中，收有「官船」之圖，與《三才圖會》圖，幾乎相同，經比對內閣文庫現存唯一的彩圖本，船旗為黃底紅日，上下並有紅色彩邊，顯然有別於日章旗（圖 19）。⁶⁸ 至清代以後，現存官方製作的圖繪如王翬等繪的〈康熙南巡圖〉（1691-1693）（圖 20）或是陳枚等的〈清院本清明上河圖〉（1736）（圖 21）、徐揚〈姑蘇繁華圖〉（〈盛世滋生圖〉，1759）（圖 22）、同徐揚等的〈乾隆南巡圖〉（1770）中的官民船隻懸掛的旗幟，均未見有類似「日月旗」的旗幟，因此，〈長崎貿易圖〉和〈海洋清晏圖〉所繪「日章旗」極有可能是為了強調日本貿易而繪。這不禁令人聯想此二圖製作者的關連性，即使由不同畫工繪製，且年代不同，其繪製目的與背後主導繪製者有可能是同一人，或是同為江南的三織造？

〈長崎貿易圖〉的製作，因未見官方檔案記載，且如前述《石渠寶笈三編》著錄所記，對內容之說明「文俚不錄」，故非如〈海洋清晏圖〉是奉官命所作，而是地方官命商人繪製後上呈之物，二圖描述的內容亦有區別。原（底）稿作者應是通書畫並曾去過長崎商人。當時貿易商中，精於書畫者不少，如雍、乾、嘉時期渡日的李用雲、費漢源、伊孚九、張秋谷、方西園、孟涵九、費晴湖、江稼圃等人，康熙時期也有不少類似人物。⁶⁹ 商人繪製的底稿再經專業畫師繪製後上呈清宮。最後的「唱戲」和「看會」應該是在貿易活動外，為介紹日本風俗給清朝官員，因而特別繪製的場景，這也顯示出當時兩國間安定、和平的意象。如曹寅在〈日本燈詞〉中藉日本國王之言，強調「今者中華聖人御極，海不揚波，通商薄賦，黎庶沾恩，俺們外國無以答報，惟有禮佛拜天，頂祝無疆聖壽」，對其恭順態度的描繪，正與莫爾森報告的主旨一致。⁷⁰ 據此，可推測創作年代應非二國關係緊張的相互嚴防的雍正時期，此作品後來會收入乾隆收藏的《石渠寶笈》內，也

城——蘇州之繁華：仇英《清明上河圖》（辛丑本）研究論文集》（蘇州：古吳軒出版社，2017），頁 466-488。

68 〈江戸〉中川忠英編，《清俗紀聞》（東都：書林堀野屋仁兵衛，1799，早稻田大學圖書館藏），卷 10，「羈旅行李」，頁 10a。彩圖進呈本無出版地，東京國立公文書館內閣文庫藏，卷次、頁碼同。

69 參看澀谷區立松濤美術館編，《特別展橋本コレクション・中國の繪畫——來船畫人》（東京：澀谷區立松濤美術館，1986）；唐權、劉建輝、王紫沁，〈來船清人研究ノート：附「來船清人參考文獻」「來船清人一覽表」〉，《日本研究》，62 卷（2021.3），頁 131-172。

70 柳山居士（曹寅）撰，《太平樂事》所收〈日本燈詞〉（臺北：國家圖書館藏鈔本）。

反映出乾隆帝當時對異域文物的好奇，渴望萬國來朝的心態。前述乾隆二十五年（1760）內務府造辦處《活計檔》記載，乾隆帝命輿圖房查有祥瑞各圖送呈覽一事，其中被挑選送呈的〈海洋清晏〉圖手卷，也正說明了此一事實。

與〈海洋清晏圖〉不同之處，〈長崎貿易圖〉冊為對長崎貿易流程、唐館生活、貿易、娛樂細節的描繪，而〈海洋清晏圖〉則著重於全景，從航程到對長崎港內地理景觀、建築、防衛的做整體描繪，二者互補，結合成一幅理解整體長崎貿易的概況圖。

四、結語

本文所介紹的〈海洋清晏圖〉與〈長崎貿易圖〉的最大特點為二者均為中國人所繪，彌補了中日交流史上對日本認識圖像史料的不足。其製作背景與當時長崎貿易，對日本銅採辦有相當大的關係。清朝皇帝為理解日本國內的真實情況，而派遣人員及商人赴日調查，並製作圖像。〈海洋清晏圖〉即為康熙四十年（1701）命江南三織造派遣人員赴日調查返國後所繪製者。原圖卷最早為江寧織造曹寅所收藏，似乎並未立即呈送康熙帝，曹寅死後（亦有可能生前）收入清宮中，內容描繪由上海到長崎港的海路航程景象，特別又著重對長崎港景物的描繪，並對特殊地點、景物、建築、船隻貼上榜題文字說明，是迄今所知中國人最早繪製的長崎港圖像，由於現存照片圖像模糊不清，特別是榜題文字有許多無法辨識，無法理解圖中相關地景的說明，而摹本〈琉球國圖〉則缺榜題文字，細部描繪亦有省略，對此二圖卷的分析，仍有發揮的餘地。〈長崎貿易圖〉由八張冊頁所組成，每張頁面又分為右圖左文二部分，將當時長崎貿易活動流程，依「起貨」、「南京寺」、「王取貨」、「丟票」、「出貨」、「開漆器店」、「唱戲」及「看會」之順序，描繪了從唐船抵港到交易完成的重要環節，圖像配合文字說明，對當時長崎貿易情況和日本風俗的理解有相當大的幫助。二圖一為上海至長崎的航路及對長崎港內地理景觀、建築、防衛的整體描繪，一為對長崎貿易流程、唐館生活、貿易、娛樂的描繪，二者互補，結合成一幅理解整體長崎貿易的概況圖。

二圖所描繪的內容，由圖名「海洋清晏」所示，呈現出的是安定和平的海洋貿易圖像，〈長崎貿易圖〉所呈現的意象亦同，正規貿易手續流程外，另加入「唱戲」、「看會」場景，也顯示出安定、和平的意象。據此，可推測此圖創作年代應

非二國關係緊張、相互嚴防的雍正中後期，由其描繪內容可推測是在十八世紀初 1702 年新地貨庫建立不久至 1715 年實施正德新例，發行信牌之前的康熙末年，且極有可能與江南地方的織造（特別是曹寅、李煦）有密切關連。此二圖在乾隆二十六年（1761）編製的內務府造辦處輿圖房目錄《蘿圖薈萃》中均有收錄；〈長崎貿易圖〉之後也被收入乾隆收藏的《石渠寶笈三編》內，反映出乾隆帝當時對異域文物的好奇，渴望萬國來朝的心態。

以往，囿於史料不足，一般普遍認為清代執政者對外國事務漠不關心，但至少到乾隆前期為止，並非如此。在關係國家利益、政權安危時，執政者均會以務實態度積極派員調查，就中日關係而言，康、雍、乾三帝都透過不同管道調查日本情況，因而做出有利於本國的政策判斷。同樣的事例，康熙五十六年（1717）禁止南洋貿易（但東洋日本貿易照舊）時，曾令廣東、福建沿海一帶水師加強巡查往來商船，違禁者，嚴拏治罪。閩浙總督覺羅滿保、福建水師提督施世驃就奉命分別編製了〈西南洋各番針路方向圖〉和〈東南洋海道圖〉呈送朝廷參考。⁷¹ 乾隆中期以後，由於清朝國內銅產增加，中日貿易情勢趨於安定，貿易運作及船隻往來制度化，兩國間貿易就在無外交往來的情況下，延續至太平天國戰亂的 1860 年，其主要原因在於兩國對彼此特產品及資訊等的相互需求。

71 二圖均藏於北京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參看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澳門一國兩制研究中心選編，《澳門歷史地圖精選》（北京：華文出版社，2000），頁 34、38。另李孝聰，〈中外古地圖與海上絲綢之路〉，《思想戰線》，2019 年 3 期，頁 115-118，對此二圖有介紹說明。

引用書目

傳統文獻

- (明)王圻、王思義輯,《三才圖會》,收入《續修四庫全書》,冊 1235,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據上海圖書館藏明萬曆三十五年刻本影印。
- (明)徐一夔撰,《大明集禮》,中研院傅斯年圖書館藏嘉靖九年刊本。
- (清)托津等纂,《大清會典圖(嘉慶朝)》,收入《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輯 71,臺北:文海出版社,1992,據清嘉慶二十三年刻本影印。
- (清)阿里袞、裘曰修等輯,《蘿圖薈萃》,刊本收入汪前進選編,《中國地圖學史研究文獻集成》,冊 5,西安:西安地圖出版社,2007。
- (清)呂燕昭修,姚鼐纂,《嘉慶》《新修江寧府志》,收入《續修四庫全書》,冊 695,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據清嘉慶十六年刊本影印。
- (清)汪鵬,《袖海編》,收入(清)王錫祺輯,《小方壺齋輿地叢鈔》,第 10 帙,臺北:學生書局影印,1985,據清光緒三年上海著易堂排印本影印。
- (清)柳山居士(曹寅)撰,《太平樂事》,臺北:國家圖書館藏鈔本。
- (清)英和等輯,《欽定石渠寶笈三編》〈御書房藏四〉,收入《續修四庫全書》,冊 1079,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2002,據清嘉慶內府抄本影印。
- (清)翁廣平編,《吾妻鏡補》,收入王寶平編著,《吾妻鏡補——中國人による最初の日本通史》,京都:朋友書店,1997。
- (清)嵇曾筠等監修,雍正《浙江通志》,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 522,臺北:商務印書館,1983-1986,據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清乾隆四十七年文淵閣本影印。
- (清)童華,《童氏雜著》,收入北京圖書館古籍出版編輯組編,《北京圖書館古籍珍本叢刊》,冊 79,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88,據北京圖書館藏雍正十三年序刊本影印。
- (清)曹寅,《棟亭書目》,收入《遼海叢書》,瀋陽:遼瀋書社,1985,據遼海書社民國二十三年排印本影印。
- (清)趙爾巽等撰,《清史稿》,北京:中華書局,1977。
- (清)慶桂等輯,《國朝宮史續編》,收入《續修四庫全書》,冊 825,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據遼寧省圖書館藏清嘉慶十一年內府抄本影印。
- (清)慶桂等輯,左步青點校,《國朝宮史續編》,北京古籍出版社,1994。
-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整理,《康熙起居注》,北京:中華書局,1984。
- 故宮博物院明清檔案部編,《李煦奏摺》,北京:中華書局,1976。
- 故宮博物院明清檔案部編,《關於江寧織造曹家檔案史料》,北京:中華書局,1975。
- 國立故宮博物院編,《宮中檔雍正朝奏摺》,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1977-1980。

（江戶）不著撰者，久留島浩、原田博二、河野謙解說，《秘藏！長崎くんち繪卷：大阪府立中之島圖書館所藏繪卷・崎陽諏訪明神祭祀圖》，長崎：長崎文獻社，2006。

（江戶）中川忠英編，《清俗紀聞》，東都：書林堀野屋仁兵衛，1799，早稻田大學圖書館藏。

（江戶）中川忠英編，《清俗紀聞》（彩繪本），不著刊年，（日本）國立公文書館內閣文庫藏。

（江戶）田邊茂啓，《長崎實錄大成》，長崎：長崎文獻社，1973。

（江戶）饒田喻義編，《長崎名勝圖繪》，長崎：長崎史談會，1931。

（明治）司法省藏版，法制史學會編，《德川禁令考・前集第六》，東京：創文社，1959。

近代論著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澳門一國兩制研究中心選編，《澳門歷史地圖精選》，北京：華文出版社，2000。

方曉偉，《曹寅評傳年譜》，揚州：廣陵書社，2010。

王利器編，《李士禎李煦父子年譜：紅樓夢與清初史料鉤玄》，北京：北京出版，1983。

王來特，《近世中日通商關係史研究：貿易模式的轉換與區域秩序的變動》，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18。

王振忠，〈長崎唐館圖〉，《讀書》，2014年4期，頁146-156。

史景遷（Jonathan D. Spence），溫洽溢譯，《曹寅與康熙：一個皇帝寵臣的生涯揭秘（Ts'ao Yin and the K'ang-hsi Emperor）》，臺北：時報文化，2012。

朱龍興，〈《長崎貿易圖冊》初探〉，《故宮文物月刊》，335期，2011年2月，頁106-113。

朱龍興，〈視野的轉換——院藏《長崎貿易圖冊》所見的日本祭典〉，《故宮文物月刊》，389期，2015年8月，頁94-107。

朱龍興，〈東瀛華蹤——《長崎貿易圖冊》中的華人住所〉，《故宮文物月刊》，404期，2016年11月，頁72-85。

李孝聰，〈中外古地圖與海上絲綢之路〉，《思想戰線》，2019年3期，頁110-124。

孟曉旭，《漂流事件與清代中日關係》，北京：中國社科出版社，2010。

易惠莉，〈論入關前後的清與日本關係〉，《學術月刊》，2001年1期，頁62-67。

易惠莉，〈清康熙朝後期政治與中日長崎貿易〉，《社會科學》，2004年1期，頁96-105。

易惠莉，〈清代中前期的對日關係認識〉，《思想與文化》，5輯，2005年12月，頁339-384。

- 唐偉明，〈以《三才圖會》解析仇英《清明上河圖》（辛丑本）〉，收入單國霖主編，《大明古城——蘇州之繁華：仇英《清明上河圖》（辛丑本）研究論文集》，蘇州：古吳軒出版社，2017，頁 466-488。
- 唐權，〈“倭語”之戲：曹寅《日本燈詞》研究〉，《清華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3 年 2 期，頁 52-65。
- 孫文，《唐船風說：文獻與歷史——〈華夷變態〉初探》，北京：商務印書館，2011。
- 孫欲容，〈徐葆光《琉球國貢全圖》與清代琉球形象的建構〉，《中國文哲研究通訊》，26 卷 1 期，2016 年 3 月，頁 61-81。
- 秦國經、劉若芳，〈清朝輿圖的繪製與管理〉，收入曹婉如等編，《中國古代地圖集（清代）》，北京：文物出版社，1997，頁 71-78。
- 張愛麾、王煒民，〈近三十年來鹵簿制度研究綜述〉，《陰山學刊》，26 卷 2 期，2013 年 4 月，頁 79-84。
- 國立北平故宮博物院文獻館編，《清內務府造辦處輿圖房圖目初編》，北平：北平故宮博物院文獻館，1936。
- 黃一農，〈江南三織造所織出的曹家姻親網絡〉，《曹雪芹研究》，2014 年 3 期，頁 10-25。
- 黃國盛，《鴉片戰爭前的東南四省海關》，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0。
- 劉若芳，〈清宮輿圖房的設立及其管理〉，收入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明清檔案與歷史研究論文集：慶祝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成立 70 週年》，北京：中國友誼出版社，2000，頁 1282-1295。
- 劉序楓，〈論清代的中日貿易與貿易結帳方式〉，《淡江史學》，10 期，1999 年 6 月，頁 185-202。
- 劉序楓，〈清康熙～乾隆年間洋銅的進口與流通問題〉，收入湯熙勇主編，《中國海洋發展史論文集·第 7 輯·上冊》，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山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所，1999，頁 93-144。
- 劉序楓，〈清代環中國海域的海難事件研究——以清日兩國間對外國難民的救助及遣返制度為中心 1644-1861〉，收入朱德蘭主編，《中國海洋發展史論文集·第 8 輯》，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山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所，2002，頁 173-238。
- 劉序楓，〈德川「鎖國」體制下的中日貿易：以長崎「唐館」為中心的考察（1689-1868）〉，收入海洋史叢書編輯委員會編，《港口城市與貿易網絡》，（臺北：中央研究院人社中心，2012，頁 81-124。
- 薛明，〈日本學界關於清代中前期中日關係史的研究〉，《外國問題研究》，2012 年 3 期，頁 30-37。
- 薛明，《清前期的中日關係研究》，瀋陽：遼寧大學出版社，2014。

- 大井昇，《長崎繪圖帖の世界》，長崎：長崎文獻社，2018。
- 大庭脩，《江戸時代の日中秘話》，東京：東方書店，1980。
- 大庭脩，《江戸時代における中國文化受容の研究》，京都：同朋舎，1984。
- 大庭脩，《徳川吉宗と康熙帝》，東京：大修館書店，1999。
- 大庭脩編，《長崎唐館圖集成》，大阪：關西大學東西學術研究所，2003。
- 山脇悌二郎，《近世日中貿易史の研究》，東京：吉川弘文館，1960。
- 山脇悌二郎，《長崎の唐人貿易》，東京：吉川弘文館，1964。
- 中村質，《近世長崎貿易史の研究》，東京：吉川弘文館，1988。
- 夫馬進編，《増訂使琉球錄解題及び研究》，宜野灣：榕樹書林，1999。
- 内田魯庵，〈典籍の廢墟〉，收入氏著，《内田魯庵全集》，第8卷，東京：ゆまに書房，1987，頁280-367。
- 内藤湖南，《内藤湖南全集》，第14卷，東京：筑摩書房，1976。
- 内務省社會局編，《大正震災志》下，東京：内務省社會局，1926。
- 太田勝也，《鎖國時代長崎貿易史の研究》，京都：思文閣，1992。
- 永山時英編，《對外史料美術大觀》，長崎：藤木博英社，1918。
- 田中壯吉編，《日中友好的先驅者「文求堂」主人田中慶太郎》，東京：極東物産，1991。
- 田仲一成，〈清代蘇州織造と江南俳優ギルド〉，《東方學》，35輯，1968年1月，頁113-129。
- 矢野仁一，《長崎市史・通交貿易編東洋諸國部》，長崎：長崎市役所，1938。
- 任鴻章，《近世日本と日中貿易》，東京：六興出版社，1988。
- 佐伯富，〈康熙雍正時代における日清貿易〉，《東洋史研究》，16卷4號，1958年3月，頁375-415。
- 李慶國，〈郭沫若と文求堂主人田中慶太郎〉，《アジア文化學科年報》，8號，2005年11月，頁49-60。
- 承志，《ダイチン・グルンとその時代：帝國の形成と八旗社會》，名古屋：名古屋大學出版會，2009。
- 岩井茂樹，〈清代の互市と“沈黙外交”〉，收入夫馬進編，《中國東アジア外交交流史の研究》，京都：京都大學學術出版會，2007，頁358-377。
- 岩井茂樹，《朝貢・海禁・互市：近世東アジアの貿易と秩序》，名古屋：名古屋大學出版會，2020。

東京帝國大學文學部史料編纂掛編，《第十一回史料展覽會列品目錄》，1923年5月4-7日，東京：東京帝國大學文學部史料編纂掛，1923。

松浦章，〈杭州織造烏林達莫爾森の長崎來航とその職名について——康熙時代の日清交渉の一側面〉，《東方學》，55輯，1978年1月，頁62-75。

松浦章，《清代海外貿易史の研究》，京都：朋友書店，2002。

松浦章，《江戸時代唐船による日中文化交流》，京都：思文閣，2007。

松浦章，《海外情報からみる東アジア—唐船風説書の世界—》，大阪：清文堂，2009。

松浦章，《清代帆船沿海航運史の研究》，大阪：關西大學出版部，2010。

河内良弘編，《滿洲語辭典》，京都：松香堂書店，2014。

長崎縣史編集委員會，《長崎縣史・對外交渉編》，東京：吉川弘文館，1986。

宮崎市定，〈探聽日本動靜摺〉，收入氏著，《政治論集》，東京：朝日新聞社，1971，頁255-279。

原田尾山，《日本現在支那名畫目錄》，東京：大塚巧藝社，1938。

浦廉一，〈明末清初の鮮滿關係上に於ける日本の地位（一）、（二）〉，《史林》，19卷2、3號，1934年4、7月，頁246-270、534-558。

唐權、劉建輝、王紫沁，〈來舶清人研究ノート：附「來舶清人參考文獻」「來舶清人一覽表」〉，《日本研究》，62卷，2021年3月，頁131-172。

陶德民，《もう一つの内藤湖南像—關西大學内藤文庫探索二十年》，大阪：關西大學出版部，2021。

深瀬公一郎，〈十七世紀後半の長崎港における船旗の役割〉，《長崎歴史文化博物館研究紀要》，5號，2011年3月，頁67-80。

麻生伸一、茂木仁史編，《冊封琉球全圖：一七一九年の御取り持ち》，東京：雄山閣，2020。

彭浩，《近世日清通商關係史》，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2015。

劉序楓，〈十七、十八世紀の中國と東アジア——清朝の海外貿易政策を中心に〉，收入溝口雄三等編，《アジアから考える・2・地域システム》，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1993，頁87-129。

劉序楓，〈漂流、漂流記、海難〉，收入桃木至朗等編，《海域アジア史研究入門》，東京：岩波書店，2008，頁217-224。

稻葉君山，〈海洋清宴圖と日章旗〉，《日本及日本人》，697號，1917年1月，頁99。

澀谷區立松濤美術館編，《特別展橋本コレクション・中國の繪畫——來舶畫人》，東京：澀谷區立松濤美術館，1986。

網路資料

丁治平，〈布朗大學圖書館藏《欽定剿平七省方略圖說》旗幟圖攷〉，2021年8月，<https://storymaps.arcgis.com/stories/49d5d137fce94baeb28344bfb7234b16>，檢索日期：2022年2月25日。

京都大學貴重資料デジタルアーカイブ，〈崎陽唐館交易圖〉，<https://rmda.kulib.kyoto-u.ac.jp/item/rb00013549>，檢索日期：2021年10月1日。

焦秉貞，〈南巡蘇州虎丘行宮圖卷〉，卓克藝術網，<http://auction.zhuokearts.com/art/26510911.shtml>，檢索日期：2022年3月1日。

焦秉貞，〈康熙南巡圖卷〉，雅昌藝術網，<https://auction.artron.net/paimai-art58781265>，檢索日期：2022年3月1日。

圖版出處

- 圖 1 清，佚名，〈海洋清晏圖〉，原圖亡佚。圖版取自永山時英編，《對外史料美術大觀》，長崎：藤木博英社，1918，圖 89（其一，其二）。
- 圖 2 江戶，佚名，〈寬文長崎圖屏風〉，長崎歷史文化博物館藏。圖版取自長崎市立博物館編，《長崎市立博物館資料圖錄 I》（繪畫編 I），長崎：長崎市立博物館，1992，頁 40-41。
- 圖 3 江戶，佚名，〈長崎鳥瞰圖屏風〉，神戶市立博物館藏。圖版取自神戶市立博物館編，《日中歷史海道 2000 年》，神戶市立博物館，1997，頁 102-103。
- 圖 4 清，（傳）焦秉貞，〈琉球國圖〉，題簽、落款及鈐印，守屋壽コレクション，廣島縣立歷史博物館藏，作者攝。
- 圖 5-1 清，（傳）焦秉貞，〈琉球國圖〉，局部，黃浦江上海港，守屋壽コレクション，廣島縣立歷史博物館提供。
- 圖 5-2 清，（傳）焦秉貞，〈琉球國圖〉，局部，長崎灣，守屋壽コレクション，廣島縣立歷史博物館提供。
- 圖 5-3 清，（傳）焦秉貞，〈琉球國圖〉，局部，長崎港，守屋壽コレクション，廣島縣立歷史博物館提供。
- 圖 6 清，佚名，〈海洋清晏圖〉，局部，原圖亡佚。圖版取自永山時英編，《對外史料美術大觀》，長崎：藤木博英社，1918，圖 89（其一）。
- 圖 7 左圖，〈海洋清晏圖〉，局部，原圖亡佚。圖版取自永山時英編，《對外史料美術大觀》，長崎：藤木博英社，1918，圖 89（其二）；右圖，清（1870 年代），佚名，〈上海縣水道營汎圖〉，局部，大英圖書館藏。圖版取自中央研究院數位方輿資料庫，https://digitalatlas.asdc.sinica.edu.tw/digitalatlasen/map_detail.jsp?id=A104000071，檢索日期：2022 年 2 月 27 日。
- 圖 8 清，佚名，〈長崎貿易圖〉，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 圖 9 江戶，佚名，〈在長崎日清貿易繪卷〉，局部，「王取貨」，平戶松浦史料博物館藏。圖版取自大庭脩編，《長崎唐館圖集成》，大阪：關西大學東西學術研究所，2003，頁 87。
- 圖 10 江戶，佚名，〈崎陽唐人屋鋪圖形〉，局部，「開漆器店」，京都大學附屬圖書館藏。圖版取自大庭脩編，《長崎唐館圖集成》，大阪：關西大學東西學術研究所，2003，頁 37。
- 圖 11 清？，佚名，〈崎陽唐館交易圖〉，京都大學附屬圖書館藏。圖版取自大庭脩編，《長崎唐館圖集成》，大阪：關西大學東西學術研究所，2003，頁 60-75。
- 圖 12 大正（1916），佚名，〈唐人屋敷圖〉（摹本），東京大學史料編纂所藏。圖版取自大井昇，《長崎繪圖帖の世界》，長崎：長崎文獻社，2018，頁 74。

- 圖 13 左圖，清，佚名，〈長崎貿易圖〉，「丟票」，局部，國立故宮博物院藏；右圖，清，佚名，〈海洋清晏圖〉，局部，原圖亡佚。圖版取自永山時英編，《對外史料美術大觀》，長崎：藤木博英社，1918，圖 89（其一）。
- 圖 14 江戶（18 世紀中期以後），佚名，〈唐人屋鋪圖〉，平戶松浦史料博物館藏，作者攝。
- 圖 15 左圖，〈長崎貿易圖〉，「起貨」，局部，國立故宮博物院藏；右圖，江戶，石崎融思（1768-1846），〈唐船入津丸荷役之圖〉，長崎縣美術館藏。圖版取自大庭脩編，《長崎唐館圖集成》，大阪：關西大學東西學術研究所，2003，頁 125。
- 圖 16 江戶，佚名，〈寬文長崎圖屏風〉，局部，長崎歷史文化博物館藏。圖版取自長崎市立博物館編，《長崎市立博物館資料圖錄 I》（繪畫編 I），長崎：長崎市立博物館，1992，頁 40-41。
- 圖 17-1 上圖，〈海洋清晏圖〉，局部，原圖亡佚。圖版取自永山時英編，《對外史料美術大觀》，長崎：藤木博英社，1918，圖 89（其一）；下圖，〈琉球國圖〉，局部，廣島縣立歷史博物館提供。
- 圖 17-2 上圖，〈海洋清晏圖〉，局部，原圖亡佚。圖版取自永山時英編，《對外史料美術大觀》，長崎：藤木博英社，1918，圖 89（其二）；下圖，〈琉球國圖〉，局部，廣島縣立歷史博物館提供。
- 圖 17-3 上圖，〈長崎貿易圖〉，「起貨」，局部，國立故宮博物院藏；下圖，清？，佚名，〈崎陽唐館交易圖〉，「起貨」，局部，京都大學附屬圖書館藏。圖版取自大庭脩編，《長崎唐館圖集成》，大阪：關西大學東西學術研究所，2003，頁 60。
- 圖 18 明，（傳）仇英，〈清明上河圖〉，局部，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 圖 19 左圖，（明）王圻、王思義輯，《三才圖會》（萬曆 37 年序刊本），局部，（臺北）國家圖書館藏；右圖，江戶，中川忠英編，《清俗紀聞》（彩圖本），局部，國立公文書館內閣文庫藏，作者攝。
- 圖 20 清，王翬等，〈康熙南巡圖〉（1691-1693），第 7 卷，蘇州閶門附近，局部，加拿大亞伯達大學博物館（Mactaggart Art Collection, University of Alberta Museums）藏。圖版取自 University of Alberta Museums. “Kangxi Emperor’s Southern Inspection Tour, Scroll Seven: Wuxi to Suzhou.” Accessed Feb 27, 2022. <https://search.museums.ualberta.ca/21-20555>.
- 圖 21 清，陳枚等，〈清院本清明上河圖〉（1736），局部，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 圖 22 清，徐揚，〈姑蘇繁華圖〉（盛世滋生圖，1759），局部，遼寧省博物館藏。圖版取自徐揚，〈姑蘇繁華圖〉，香港：商務印書館，1988，無頁碼。

Qing Investigations into Japan during the Reign of Kangxi: Centering on Two Old Drawings of Nagasaki in the Qing Palace*

Liu, Shiuh-feng**

Abstract

This paper deals with two old drawings on Nagasaki trade deposited in the Qing palace regarding their contents, background and date of production, Sino-Japanese relations surrounding the Nagasaki trade during the early Qing dynasty (1662-1735), and Qing China's knowledge of Japan.

Based on the author's research in this study, these two drawings were both made in the early 18th century during the reign of Kangxi (1662-1722); one is named *Haiyang qingyan tu* 海洋清晏圖 (Scroll Representing Chinese Junks on the Voyage to Nagasaki) while the other one *Changqi maoyi tu* 長崎貿易圖 (Scenes of Nagasaki Trade). The two were originally deposited in the Qing palace. *Haiyang qingyan tu* was brought to Japan during the late Qing-early Republican era and collected by the library of Tokyo Imperial University but unfortunately destroyed in the 1923 Great Kanto earthquake; now only a collotype print survives. *Changqi maoyi tu* is now deposited at the National Palace Museum. The most distinctive feature of the two drawings is that they were both drawn by Chinese artists, and their making was connected closely with Sino-Japanese trade. The Kangxi emperor sent people to investigate into the domestic situation in Japan and the two drawings were accordingly made. The survival of the two drawings not only corroborate historical fact, but it also supplements the pictorial history of Sino-Japanese historical relations.

Keywords: Kangxi, Cao Yin, *Haiyang qingyan tu*, *Changqi maoyi tu*, Sino-Japanese trade, Nagasaki, Tōkan

* Received: 3 October 2021; Accepted: 21 December 2021

** Research Fellow, Research Center for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Academia Sinic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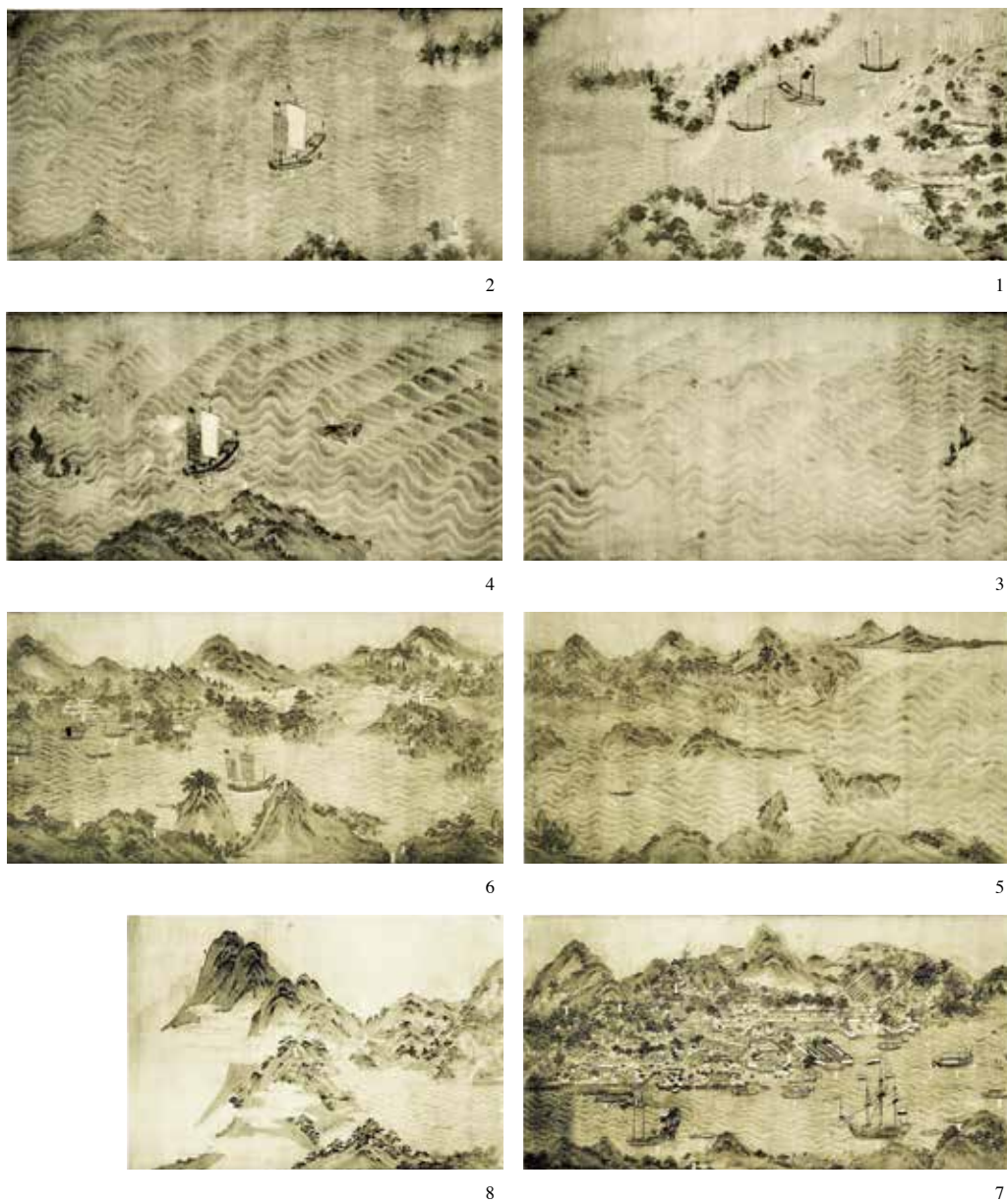


圖1 清 佚名 海洋清晏圖 原圖亡佚



圖2 江戸 佚名 寛文長崎圖屏風 長崎歴史文化博物館藏



圖3 江戸 佚名 長崎鳥瞰圖屏風 神戸市立博物館藏



圖 4 清（傳）焦秉貞 琉球國圖 題簽、落款及鈐印 守屋壽コレクション 廣島縣立歴史博物館藏



圖 5-1 清（傳）焦秉貞 琉球國圖 局部 黃浦江上海港 守屋壽コレクション 廣島縣立歴史博物館藏



圖 5-2 清（傳）焦秉貞 琉球國圖 局部 長崎灣 守屋壽コレクション 廣島縣立歴史博物館藏



圖 5-3 清（傳）焦秉貞 琉球國圖 局部 長崎港 守屋壽コレクション 廣島縣立歴史博物館藏



圖6 清 佚名 海洋清晏圖 局部 長崎港之榜題文字 原圖亡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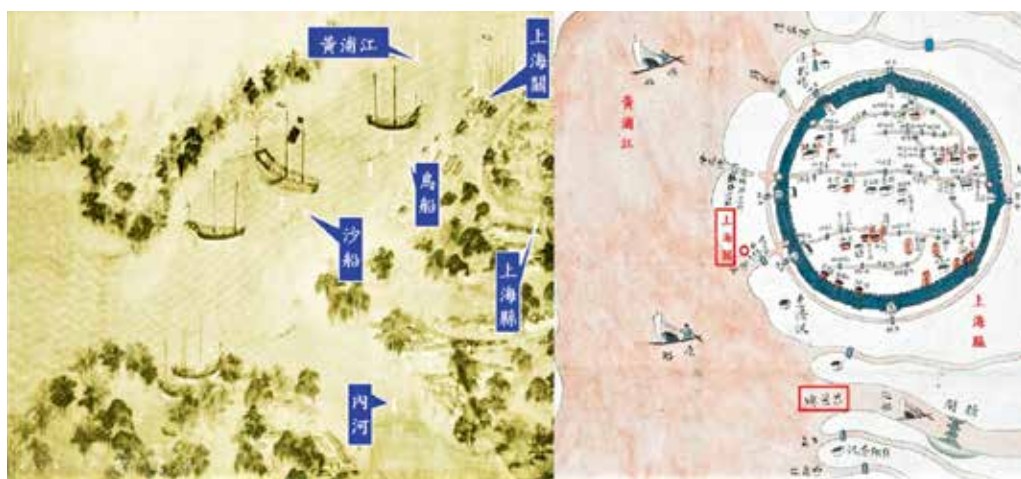


圖7 上海港周邊比較
左：清 佚名 海洋清晏圖 局部 原圖亡佚
右：清（1870年代） 佚名 上海縣水道營汎圖 局部 大英圖書館藏



圖 8 清 佚名 長崎貿易圖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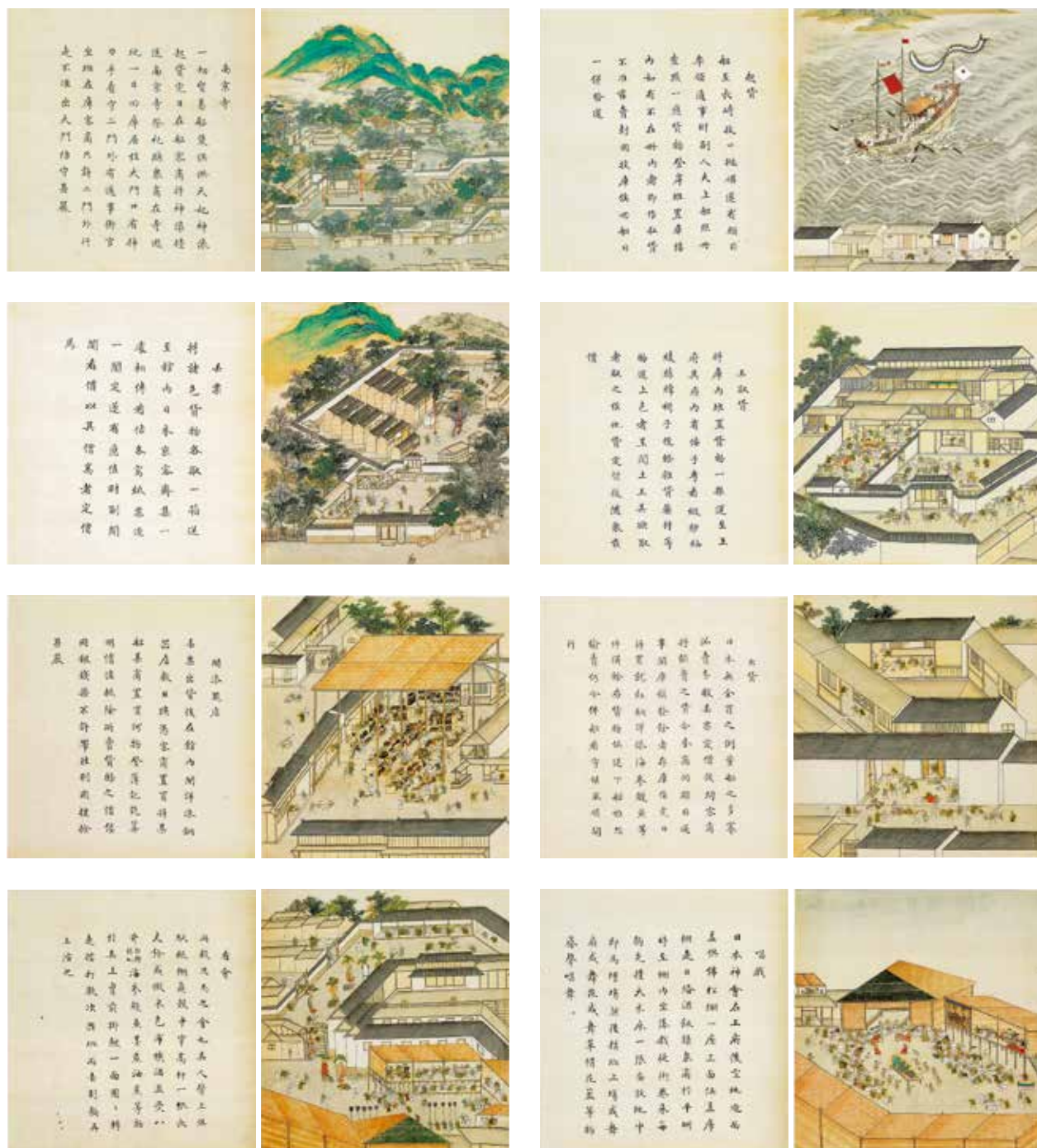


圖 11 清 佚名 崎陽唐館交易圖 京都大學附屬圖書館藏



圖9 江戸 佚名 在長崎日清貿易繪卷 局部 「王取貨」 平戸松浦史料博物館藏



圖10 江戸 佚名 崎陽唐人屋舖圖形 局部 「開漆器店」 京都大學附屬圖書館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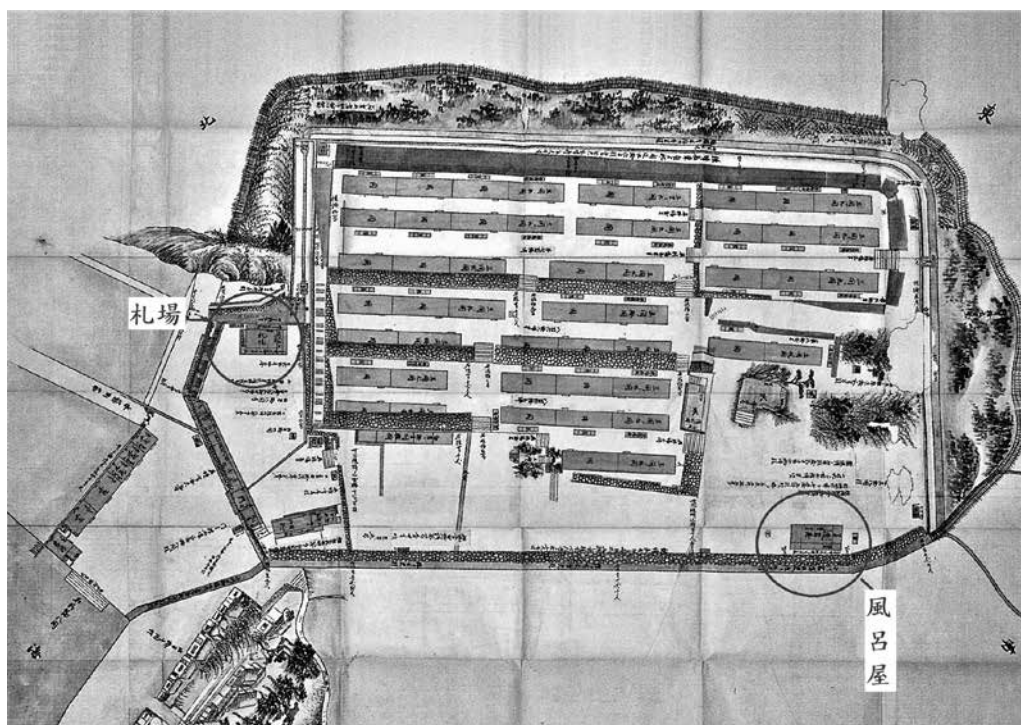


圖 12 大正 佚名 唐人屋敷圖（據古圖摹本） 東京大學史料編纂所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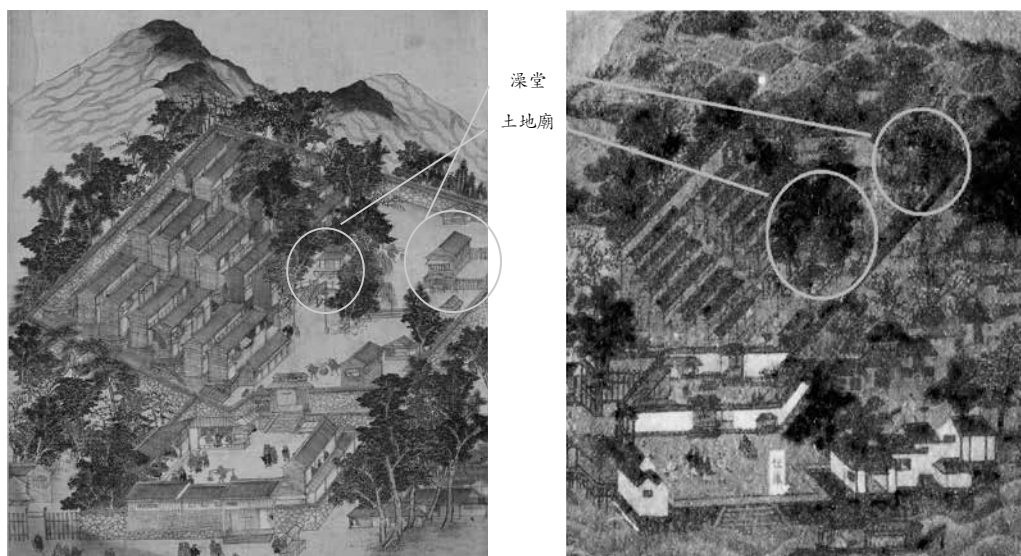


圖 13 十八世紀初期「唐館圖」比較
左：清 佚名 長崎貿易圖「丟票」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右：清 佚名 海洋清晏圖 局部 原圖亡佚



圖 14 江戸（十八世紀中期以後） 佚名 唐人屋鋪圖 平戸松浦史料博物館藏



圖 15 唐船起貨與新地貨庫
 左：清 佚名 長崎貿易圖 「起貨」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右：江戸 石崎融思 唐船入津丸荷役之圖 長崎縣美術館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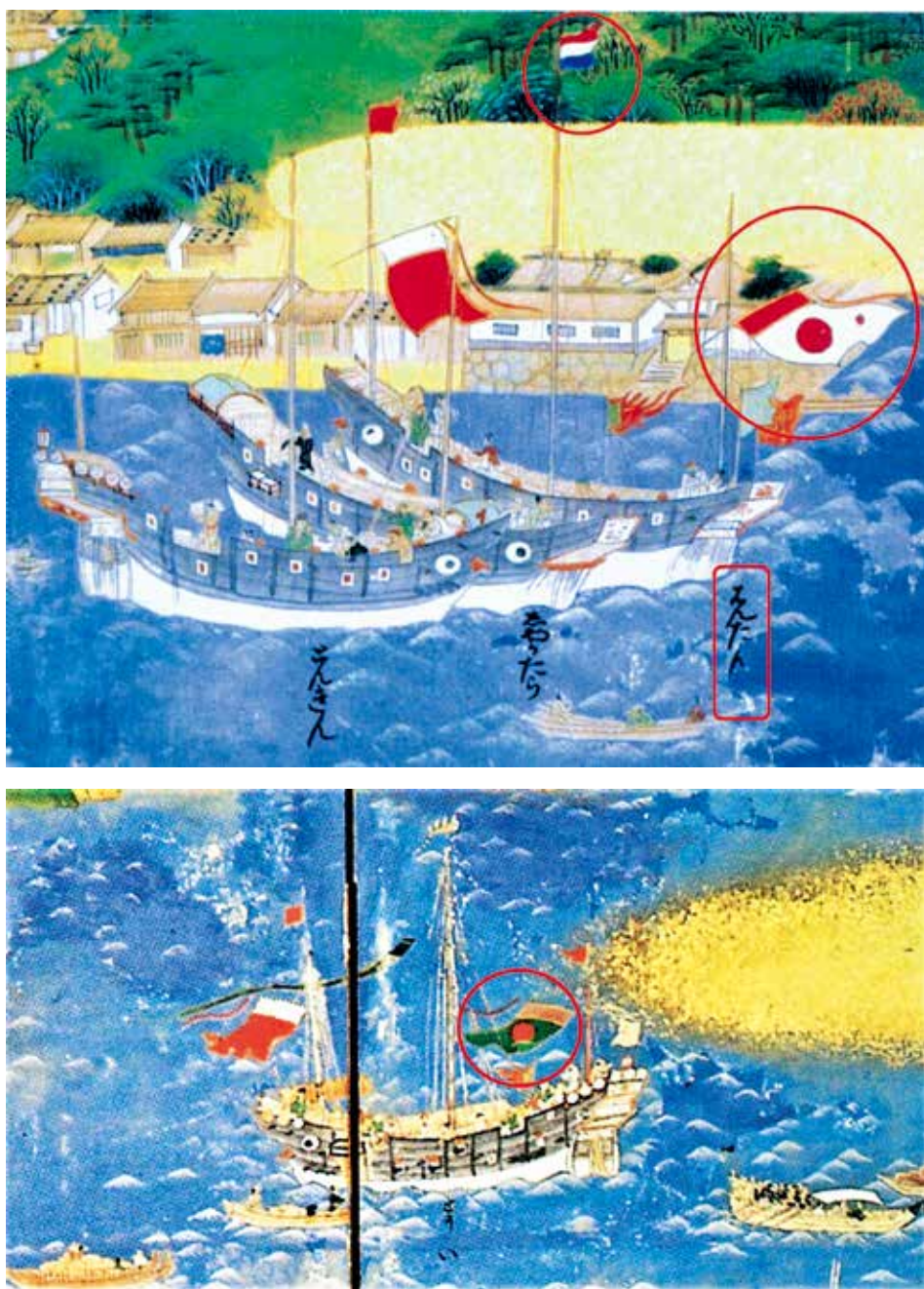


圖 16 上：江戶 佚名 寬文長崎圖屏風 局部 萬丹船船旗 長崎歷史文化博物館藏
下：江戶 佚名 寬文長崎圖屏風 局部 東寧船船旗 長崎歷史文化博物館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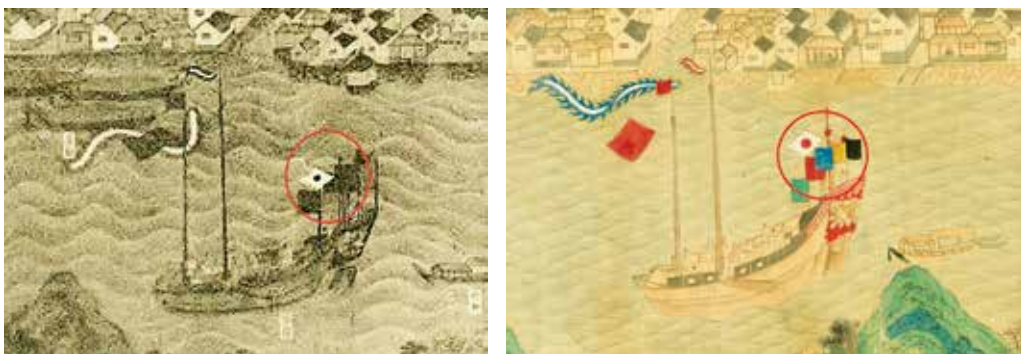


圖 17-1 左：清 佚名 海洋清晏圖 局部 原圖亡佚
 右：清 (傳) 焦秉貞 琉球國圖 局部 廣島縣立歷史博物館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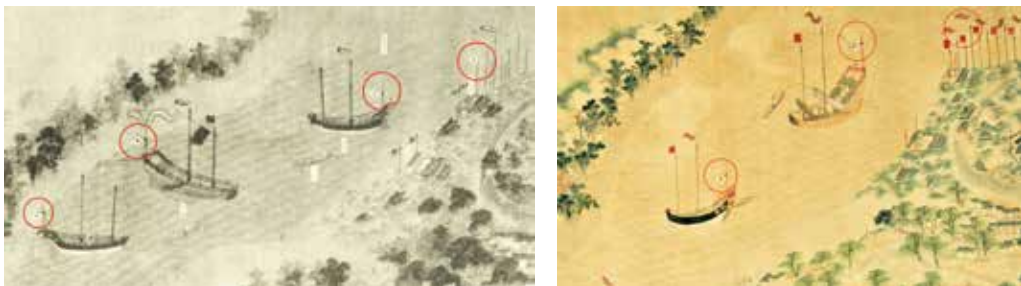


圖 17-2 左：清 佚名 海洋清晏圖 局部 原圖亡佚
 右：清 (傳) 焦秉貞 琉球國圖 局部 廣島縣立歷史博物館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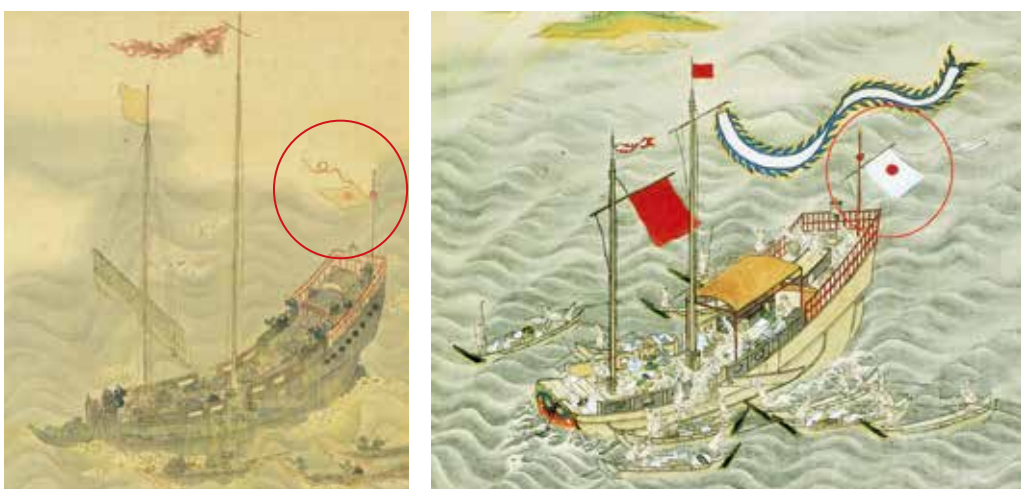


圖 17-3 左：清 佚名 長崎貿易圖 「起貨」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右：清？ 佚名 崎陽唐館交易圖 「起貨」 京都大學附屬圖書館藏



圖 18 明（傳）仇英 清明上河圖 局部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 19 左：明 王圻、王思義輯 《三才圖會》（萬曆 37 年序刊本） 「站船」 國家圖書館藏
 右：江戶 中川忠英編 《清俗紀聞》（彩圖本） 「官船」 國立公文書館內閣文庫藏



圖 20 清 王翬等 康熙南巡圖 卷七 蘇州閘門附近 局部 加拿大亞伯達大學博物館
 (Mactaggart Art Collection, University of Alberta Museums) 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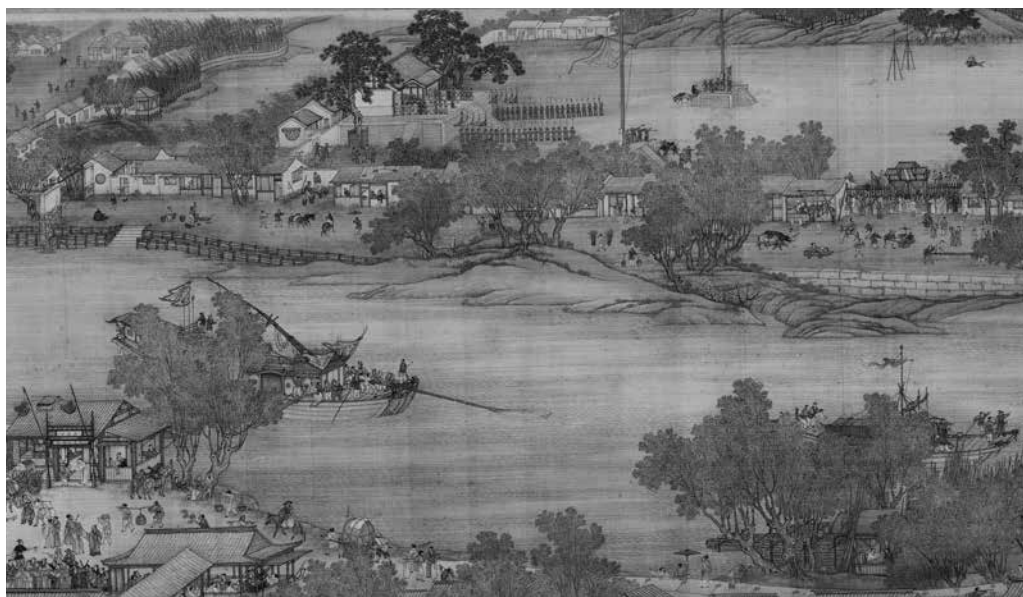


圖 21 清 陳枚等 清院本清明上河圖（1736） 局部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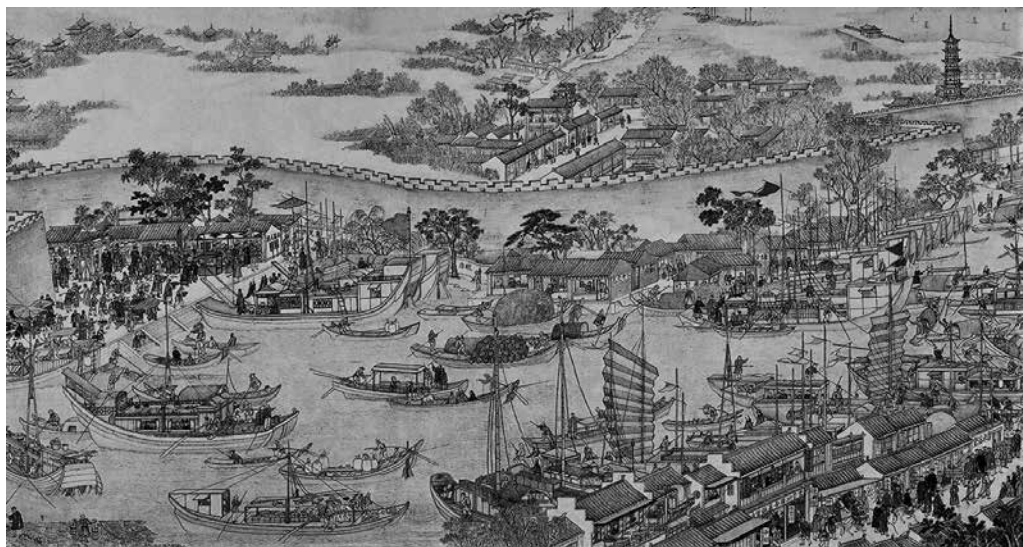


圖 22 清 徐揚 姑蘇繁華圖（盛世滋生圖） 局部 遼寧省博物館藏